

# 晚清政治改革中的蒙學公會與 《蒙學報》——以葉瀚為中心的分析\*

八百谷晃義\*\*

## 摘要

本文以晚清維新運動時期的蒙學公會與《蒙學報》為素材，以蒙學公會核心人物葉瀚為討論中心，重新建構相關史實，進而討論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趨新人士群體成長過程中，蒙學公會與《蒙學報》的特徵及其歷史意義。

甲午戰敗後，身處武昌的葉瀚原有發行報刊、創辦學堂等計畫，但因籌集資金困難、武昌風氣錮蔽等原因，均無法付諸實踐。光緒二十三年秋，葉瀚赴上海，與汪康年、汪鍾霖等江浙人士一起成立蒙學公會，並開始發行《蒙學報》。上海相對自由的環境，以及逐漸形成的上海地區學會運動的活動模式，使得葉瀚等人實踐了在武昌難以開展的事業。光緒二十四年，蒙學公會捲入圍繞著康有為集團的政治紛爭。葉瀚擬動員蒙學公會等浙江人士在上海的既有力量，試圖對抗康有為集團。稍後，葉瀚等政治

---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海外學者中國近代史論壇線上學術討論會」（2020年9月6日線上召開）。分組討論主持人復旦大學戴海斌教授、評論人香港城市大學林少陽教授為筆者提供了諸多建議，謹致謝忱。三位匿名審稿人的修改意見糾正了本文存在的諸多問題，深表謝意。非常感謝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周曉娜博士對筆者中文表達的細緻修改。另，本文是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108-2410-H-320-001-MY2）的部分成果。

\*\*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副教授

積極份子也繼續投身於庚子時期的上海士紳政治運動。故筆者認為，透過蒙學公會的活動，可以看出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士紳群體力量的成長。

**關鍵詞：**蒙學公會、蒙學報、葉瀚、汪康年、維新運動

## 一、前言

張灝（1937-2022）曾指出，甲午戰爭之後中國思想潮流起了全國性變化，在其過程中，有三項新事物成為推廣西學的重要媒介：學堂、學會與報紙。<sup>1</sup>大部分的報刊以學會刊物的形式出刊，或至少與學會有密切關係，因此學界常將學會與報刊相提並論，並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對維新運動時期學會與報刊最全面的研究，當推湯志鈞的成果。我們可以從其著作獲取各學會創立、各報刊創刊的時間，以及主要參與人士與創辦宗旨等基本信息。<sup>2</sup>

在討論維新運動時期學會歷史意義的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李文海（1932-2013）的研究。李文海認為學會有「開風氣」、「聯人才」與「伸民權」三大作用，對維新運動的進展和當時思想潮流的變化起到了很大的推進作用。<sup>3</sup>八百谷晃義在李文海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學會作為十九世紀末趨新人士的新的運動方式，具備了以下三種特質，即運用報刊和宣傳冊子等新媒介；將組織成員公諸於世的公開性；對超越一個地方或學會的官紳間橫向結合的需求。八百谷晃義認為，此種新的運動方式提高了趨新人士的政治行動能力與自信心，如保國會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在京成立時，康有為（1858-1927）等人便明確提出了讓士紳參與政治決策的要求。<sup>4</sup>另李文海還指出，維新運動時期學會運動的發展，與辛亥革命時期的立憲團體和革命團體的興起之間存在連續的成分，「戊戌時期的學會組織，對於辛亥革命準備時期的立憲團體與革命團體來說，正是一個必經的發展階段」。<sup>5</sup>張玉法同樣看出了存在於兩者之間的關係，謂「清季立憲運動，導源於戊戌

<sup>1</sup> 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臺北，1978.6），頁480-481。

<sup>2</sup> 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sup>3</sup> 李文海，〈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的學會組織〉，收入胡繩武主編，《戊戌維新運動史論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頁48-78。

<sup>4</sup> 八百谷晃義，〈清末変法運動期における学会の政治的活動〉，《歴史學研究》，901（東京，2013.1），頁35-55。

<sup>5</sup> 李文海，〈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的學會組織〉，頁78。

維新；維新與立憲，在意義上只有廣狹的區別，並無實際的不同。倡導立憲的人物，多崛起於戊戌時代；運用組織團體的方法作政治運動，亦起於戊戌時代。故論及清季立憲團體，戊戌時代實為開創時期」。<sup>6</sup>桑兵亦認為「戊戌辛亥間趨新勢力社團組織的發展保持了一脈相傳的繼替關係」。<sup>7</sup>桑兵的研究還告訴我們，除了戊戌時期的學會與立憲、革命團體之關係，還應注意學會運動與中國議會等庚辛時期官紳政治活動之間的關係。<sup>8</sup>此外，李達嘉討論以汪康年（1860-1911）為中心的江浙派維新人士的抗爭模式，認為他們的抗爭模式自維新運動時期起直至二十世紀初，呈現出演練與成長的過程。<sup>9</sup>此等先行研究均肯定維新運動時期學會、報刊的活動與官紳後來開展的政治活動之間所存在的聯繫。

過去關於學會與報刊的研究存在一個問題：即很多研究以由康有為，或梁啟超（1873-1929）等深受康有為變法理論影響的人士（本文稱之為「康有為集團」）所組織的強學會、保國會以及湖南地區的學會為討論重點，<sup>10</sup>很少研究其他地區，或受康有為集團影響不深的學會的意義。<sup>11</sup>報刊研究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正如徐佳貴指出，在目前的近代史研究中，關於《時務報》的定位，似乎

<sup>6</sup>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169。

<sup>7</sup> 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137。

<sup>8</sup> 關於中國議會，參見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頁106-154。

<sup>9</sup> 李達嘉，〈江浙派維新人士與抗爭運動新模式的創立〉，《思與言》，58（臺北，2020.12），頁1-43。

<sup>10</sup> 如上引八百谷晃義，〈清末変法運動期における学会の政治的活動〉僅就康有為集團之參與明顯的強學會、不纏足會和保國會等學會討論學會運動的意義，基本未涉及其他學會。關於湖南地區的學會，參見王爾敏，〈南學會〉，收入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101-133；八百谷晃義，〈湖南不纏足會と変法運動〉，《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38（名古屋，2014.3），頁61-96。

<sup>11</sup> 八百谷晃義曾討論過中國公會、興浙會等由浙江人士組織的學會，指出此等學會的構想中有比康有為集團的學會更先進的內容，而且浙江人士的學會運動，明顯帶有與康有為集團的學會對抗的意圖。參見八百谷晃義，〈十九世紀末における浙江士人の学会活動〉，《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41（名古屋，2017.3），頁61-94。

都可以直接投射到其他報刊上，「士人廣泛介入報務的初期歷史，遂大致呈現一個環繞著《時務報》，齊頭並進地去向『近代』的過程」。<sup>12</sup>除了《時務報》以外，與康有為集團有密切關係的《知新報》、《國聞報》等報刊尚有專論，<sup>13</sup>但其他報刊有何種獨特性？尤其是與康有為集團有何種關係？學界目前開展的研究不多。<sup>14</sup>

先行研究存在上述問題，與康有為集團的自我宣傳有關。以康有為、梁啟超為核心的康有為集團素善自我宣傳。光緒二十四年八月戊戌政變發生後，梁啟超迅速撰寫《戊戌政變記》，並在《東亞時報》、《清議報》等報刊上連載，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在日本橫濱排印出版單行本。《戊戌政變記》與康有為的《我史》、《戊戌奏稿》等相呼應，建構了以康有為集團為中心的理解維新運動的框架，對後來的歷史研究產生巨大影響。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的「改革起源」中談及學會運動，大大強調強學會的意義，說「蓋支那維新之起點，在於斯舉（強學會——引用者注。以下同），而新舊黨之相爭，亦起於斯矣」。按照梁啟超的說法，康有為集團積極參與的強學會開啟了學會、學堂和報館林立的先河，對開民智貢獻很大。而受康有為領導的湖南、廣東的「先覺之士」，實為「改革之原動力」，維新運動時期在各地湧現的學會、學堂和報館都受到了他們的影響。<sup>15</sup>當然，此種

<sup>12</sup> 徐佳貴，〈維新、經世與士人辦報——以杭州《經世報》（1897-1898）為個案再論維新報刊史〉，《新史學》，27：2（臺北，2016.6），頁96-97。

<sup>13</sup> 比如，湯志鈞、湯仁澤，《維新·保皇·知新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從中日兩國檔案看《國聞報》之內幕——兼論嚴復、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聞實踐〉，收入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從東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與人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頁107-195等。

<sup>14</sup> 現有成果除了上引徐佳貴關於《經世報》的研究之外，還有八百谷晃義，〈《湘學報》的經營、流通以及其在維新運動史上的位置〉，《新史學》，30：1（臺北，2019.3），頁55-116。

<sup>15</sup>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收入梁啟超著，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第1集，頁612-614。此部分不見《飲冰室合集》本。

由康有為集團所建構的「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式的「神話」，目前學界已提出諸多質疑。比如，賈小葉明確指出當時除有新舊之爭，在新派內部也有「康黨」與「非康黨」之爭。<sup>16</sup>

本文討論的對象是蒙學公會和《蒙學報》。作為維新運動時期的學會與報刊，蒙學公會和其刊物《蒙學報》已有一定的知名度。湯志鈞根據蒙學公會在立會時發表的〈公啟〉、〈《蒙學會報》簡章〉等史料，初步整理了蒙學公會與《蒙學報》的基本信息。<sup>17</sup>不過湯志鈞的描述過於「靜態」，除了它們的基本信息以外，鮮少提供其運作的「動態」信息。關於其出現的前史與它對後來的影響，到目前為止，學術界主要從教育史或文體轉變的角度進行研究。<sup>18</sup>除此之外，鮮少有研究討論其來龍去脈，尤其是在政治史領域。馬忠文謂「中國近代史研究一貫有側重政治史、革命史的傳統」，而具備此傳統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是由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中法戰爭、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為基本框架的」。<sup>19</sup>此種「事件史」研究模式，當然有其意義與貢獻，但往往強調各個歷史時期之間存在的斷層，相對忽視長期的歷史變化與每一個階段之間的繼承關係。那麼，從政治史視角來看，發行《蒙學報》的蒙學公

<sup>16</sup> 賈小葉，《戊戌時期學術政治紛爭研究——以「康黨」為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sup>17</sup> 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頁471-479。

<sup>18</sup> 比如傅寧認為在中國近代兒童報刊的歷史上，《蒙學報》的創刊是兒童報刊本土化的開始。參見傅寧，〈中國近代兒童報刊的歷史考察〉，《新聞與傳播研究》，2006：1（北京，2006.1），頁2-9。梅家玲認為在近代中國教育轉型的過程中，《蒙學報》透過文化傳譯試圖建立新的知識結構與表述方式，均具備了創始開新的意義。參見梅家玲，〈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傳譯、知識結構與表述方式——以《蒙學報》與《啟蒙畫報》為中心〉，收入徐蘭君、安德魯·瓊斯（Andrew F. Jones）主編，《兒童的發現——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史中的兒童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35-72。陸胤從近代中國文體變遷的視角，為《蒙學報》進行了定位。參見陸胤，〈「普通國文」的發生——清末《蒙學報》的文體試驗〉，《文學評論》，2016：3（北京，2016.5），頁129-140。

<sup>19</sup> 馬忠文，〈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戊戌變法史研究述評〉，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編，《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檢討：問題與前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272。

會在何種脈絡下成立？對後來的歷史進展又留下了何種影響？

本文作為維新運動時期學會的個案研究，盡可能梳理蒙學公會成立前後的史實、運作策略、組織結構以及所舉辦的事業，並試圖證實李文海、八百谷晃義等先行研究指出學會運動的政治化特點，也體現在蒙學公會的活動中。筆者擬進一步討論，具備此種特質的蒙學公會，與維新運動時期的政治動態有何種關係？與二十世紀初期趨新人士政治運動之間是否存在繼承關係？

本文將蒙學公會的核心人物葉瀚（1863-1933）放在討論的中心。葉瀚，杭州仁和人，生於同治二年五月九日（1863.6.24）。<sup>20</sup>他與汪康年等其他江浙籍趨新人士，在維新運動時期形成了一股有別於康有為集團的力量。<sup>21</sup>過去關於江浙籍趨新人士的研究，多將汪康年，或由其主持的《時務報》放在討論中心。本文從葉瀚這樣相對邊緣的人士看江浙籍趨新人士在維新運動時期的活動，或許有助於從更廣的視角來討論江浙籍趨新人士的活動。葉瀚留下許多寫給汪康年的書信，比較集中地談到在蒙學公會成立前後其與周邊人士的想法與活動。<sup>22</sup>葉瀚留有自傳〈塊餘生自紀〉，林盼

---

<sup>20</sup> 葉瀚，〈塊餘生自紀〉，收入丁守和、方行主編，《中國文化研究集刊》，5（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頁477。〈塊餘生自紀〉是葉瀚的自傳，下文所述葉瀚履歷，除特別註明外，皆據此文頁477-484。

<sup>21</sup> 除了上引八百谷晃義，〈十九世紀末における浙江士人の学会活動〉、徐佳貴，〈維新、經世與士人辦報——以杭州《經世報》（1897-1898）為個案再論維新報刊史〉以外，尚有廖梅認為汪康年等「江南實幹派」因「十分看不慣康有為輕浮且缺乏實幹精神的作派」，試圖區分自己的改革構想與康有為的維新思想。參見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215-219。李達嘉也特別注意到維新運動時期存在組織力與行動力遠勝於康梁的「江浙派維新人士」。參見李達嘉，〈江浙派維新人士與抗爭運動新模式的創立〉，頁2-3。此種關於維新運動時期江浙士紳政治思想與行動的研究成果，也符合楊念群關於清代江浙地區知識群體思想取向的研究。參見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頁299-366。

<sup>22</sup> 現在能看到葉瀚與汪康年的書信共有55封，參見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2522-2601。

也曾詳細梳理其在晚清時期的履歷與活動。<sup>23</sup>但兩篇文章關於葉瀚在維新運動時期的活動著墨不多，故本文的討論亦有彌補先行研究空白的意義。

## 二、蒙學公會成立前

葉瀚自稱他「少時不樂仕進，意欲以文章自見，期為古學者」。葉瀚於光緒二十年（1894）還願意應鄉試，故不能完全相信其在民國時所言「不樂仕進」，但至少可以確定，葉瀚應試之路並不順利。蒙學公會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冬成立時，葉瀚還只是一名附生。<sup>24</sup>在葉瀚成長的過程中，因覺察到國事日非、外侮日亟，其認為中國需要變法的決心遂是愈發堅定。比如，葉瀚在中法戰爭時看到督師張佩綸（1848-1903）的醜態，「憤甚，知欲中國富強，非變法不可；欲變法，非由學士大夫改其素習，學習世界語言，嫻科學，精製造不可」。面對甲午戰敗，他回憶當時「中國宜全國變法圖新之議，亦公然騰諸有識士夫之口，絕無諱忌矣」，「生每與友人私議變法次第，大率一變法立國會，一興工商，一振教育」。葉瀚研究世界歷史，認為由殖民地獨立的美國、經歷過大革命的法國均非中國效法的對象，唯有模仿英國的改革才適合中國國情。上述葉瀚的改革私議，係辛亥革命後的追憶，未必全然反應葉瀚在十九世紀末的思想，不過，葉瀚後來回顧與總結早年的經歷時，特別提到其一貫重視教育和開民智。而如下所述，除了回憶錄以外，還有其他一手史料也可以證實葉瀚一貫對教育抱有關懷。

葉瀚在成學過程中，與當時很多趨新人士一樣，對西學產生興趣，尤其對算學、中西方歷史與地理興趣濃厚。葉瀚後受知於

<sup>23</sup> 林盼，〈失蹤的「塊餘生」——辛亥之前葉瀚史實補述與考訂〉，《史林》，2016：6（上海，2016.10），頁112-122。

<sup>24</sup> 蒙學公會，〈蒙學會友題名錄〉，《蒙學報》，1（上海，1897.11），頁53。筆者使用「全國報刊資料」電子資料庫所收入的《蒙學報》。所記頁碼為該資料庫「整本瀏覽」功能中的頁碼。參見「全國報刊索引」電子資料庫，〈<https://www.cnbkisy.com/home>〉（2021/1/21）。

湖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入武昌張之洞幕府，主要參與洋務書的編纂工作，自光緒二十二年（1896）末，還擔任兩湖書院時務助教。<sup>25</sup>

葉瀚很早就開始重視童蒙教育。比如其在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一日（1895.7.3）寫給汪康年的信中，討論了汪康年擬在杭州設立崇實書院的計畫，謂「宜立書塾，招幼童十五歲以下，學習西文、算數」。葉瀚認為，中國原來「教理甚富」，但因為教學方式不得其法，不見成效，所以必須取法西方，「成就將來人材」。<sup>26</sup>關於此計畫，葉瀚於光緒二十二年初認為杭州暫無條件開設蒙塾，只好等到張之洞治下的武昌再議。<sup>27</sup>葉瀚撰寫《初學讀書要略》，還與其弟葉瀾（1875-?）一起製作《天文地理歌略》，也是出自對蒙學的關懷。葉瀚談到《初學讀書要略》與《天文地理歌略》時，涉及尋找出版方案的地方較多。此處只引一例：葉瀚跟汪康年討論二書出版計畫時，說道「卓如（梁啟超）《讀西（學）書法》，大義微言之學，不便初學，弟故另作《（初學）讀書要略》」。<sup>28</sup>此則記載說明葉瀚已覺察到康有為集團有其獨特的學術風格。此外，葉瀚因「大義微言之學，不便初學」而另外作《初學讀書要略》，可謂其對初學者之關懷深切。

在葉瀚早期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對辦報的濃厚興趣和實際行動。葉瀚在這方面的計畫有兩項：一為推廣上海《時務報》；二為擁有自家報刊。而此兩項又是緊密結合的內容。汪康年等人挪用上海強學會餘款，於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sup>25</sup> 葉瀚在張之洞幕府的活動內容，參見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310。兩湖書院自光緒十七年成立，至光緒二十八年改為兩湖高等學堂之前的大概情況，參見蘇雲峯，《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頁52-80。

<sup>26</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二〉，頁2524-2525。關於汪康年設立崇實書院的計畫，參見汪詒年編，《汪穰卿先生傳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光緒二十一年，頁66-67。

<sup>27</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四〉，頁2527。此信寫於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1896.2.19）。

<sup>28</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二十八〉，頁2566。

(1896.8.9)，在上海創刊《時務報》。<sup>29</sup>《時務報》還在醞釀時，葉瀚極度關注汪康年的籌備工作，<sup>30</sup>也計畫收購漢口《漢報》，<sup>31</sup>與汪康年的滬報相呼應。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1896.4.6)，葉瀚在信上與汪康年說，「此地《漢報》亦欲召盤」，討論與同志合資收購的辦法，<sup>32</sup>旋後又謂：

此間《漢報》亦難支持，聞姚賦秋(姚文藻)已不欲主持，今由東洋人代辦，祇有三百餘元成本，大約千番即可舉辦，再儲公積千元，方可有備無患，特不知滬上股分招集如何？葛、洪二君能否着力？甚念。……弟在此欲自任一百五十元〔五十元一股，共三股——原註。以下同〕，念劬(錢恂，1857-1927)大約二股，餘再設法張羅。《漢報》能得，則滬館必能俯首聽命，一利也；鄂垣設有分館，則長江一帶利權獨操，二利也；有分館為通銷計，不致專囿一隅，三利也。弟欲除采訪中事外，在鄂不別譯報。日報之中，祇登滬譯要電〔西報各事〕，餘則限一禮拜將日

<sup>29</sup> 關於《時務報》的籌備工作，參見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頁30-55。

<sup>30</sup> 比如，葉瀚於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初九日、二月二十三日、二月二十四日(1896.2.21、4.5、4.6)，與汪康年詢問籌備「譯報」、「滬報」的狀況，餘不贅。參見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五〉、〈葉瀚·六〉，頁2530-2533。在籌辦《時務報》時，汪康年當初想辦以翻譯為主的報刊，「譯報」之名反映此時汪康年的構想。參見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頁46-47。

<sup>31</sup> 《漢報》初名《字林漢報》，係由英國字林洋行於光緒十九年二月六日(1893.3.23)在漢口創辦的中文日報，創刊不久就改名《漢報》，後於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96.2.12)被日本人宗方小太郎(1864-1923)接管，成為日本在華首家政論報紙。在葉瀚計畫收購《漢報》的光緒二十二年初，此報剛由日本人接管，但據下文所引葉瀚書信推測，宗方小太郎或許尚無把握能否將報紙經營下去，因而考慮再轉讓中國人。具體情況未詳。《漢報》自創刊至由日本人接管前後的狀況，參見陽美燕，《日本在華首家政論報紙《漢報》(1896-1900)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21-76。日本人經營《漢報》的目標，參見中下正治，《新聞にみる日中關係史——中国の日本人經營紙》(東京：研文出版，1996)，頁63-85。

<sup>32</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六〉，頁2532-2533。

報、旬報由滬寄漢分售，如此則滬局之報，不患不能暢行，且可逐漸向沙市、宜昌、湘潭、長沙各路上行。兄謂然否？乞酌示遵照。總在滬局章程定後，此間再行遙結聲援也。切盼切盼。<sup>33</sup>

雖然收購《漢報》的計畫最終未能實現，但葉瀚此函仍可以說明其辦報與合作的構想。葉瀚謂，如果能夠購得《漢報》，可當作滬報在湖北的分館，如此不僅可以「長江一帶利權獨操」，也可以逐漸往湖北、湖南地區推廣。葉瀚還注意到與滬報分工的重要性，計畫鄂省「日報」，即《漢報》的內容以「中事」為主，除「滬譯要電」外，不刊登翻譯西報的內容，而每週代售「滬局之報」，即上海的「日報、旬報」，<sup>34</sup>則為讀者提供鄂省「日報」所未登載的內容。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葉瀚等人準備收購《漢報》的資金，除了期待能分潤上海地區透過招股籌到的資金以外，在湖北是透過他們私人的關係網籌款，未進行公開招捐等方式。

葉瀚創辦自家報刊，同時在湖北替汪康年推廣滬報的想法，在《時務報》創刊後仍在繼續討論。葉瀚在光緒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1896.11.27）寫信給汪康年，說他打算收購《漢報》館作為《時務報》總轉運局，兼辦《工商日報》。<sup>35</sup>此年年底，葉瀚與吳樵（1866-1897）、張通典（1859-1915）、譚嗣同（1865-1898）、劉善涵（1867-1920）等湖南士人合作，共同推進收購《漢報》，創辦《民聽報》的計畫。參與此計畫的人士，雖意見稍有參差，<sup>36</sup>但均重視

<sup>33</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七〉，頁2533-2534。引文中的姚文藻是英商時期《漢報》的華人主筆。參見陽美燕，《日本在華首家政論報紙《漢報》（1896-1900）研究》，頁27-28。

<sup>34</sup> 汪康年等《時務報》館人士在籌備《時務報》時，對出版週期有不同意見。汪康年力主辦日報，但黃遵憲、梁啟超主張辦旬報，參見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頁47。或許此時，汪康年有日報、旬報均辦的想法。

<sup>35</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三十〉，頁2570。

<sup>36</sup> 吳樵於光緒二十二年十月月底抵達武昌，與葉瀚討論創報事，與汪康年寫信說道，「浩（葉瀚）來商併吞《漢報》由湘礦局督銷，內籌款歸公節制之法，細思甚迂」。參見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吳樵·二十二〉，頁506。

與《時務報》館的合作。吳樵說道，他們的報刊應「與《時務（報）》表裏。《時務》，士夫之報；此報，商賈之報也。凡《時務》所及者，皆不複，而又用英商字樣，有《時務報》所不能言者，此報能言之」，<sup>37</sup>或謂「樵擬在此創一報，名曰《民聽報》，用美商招牌，其議論一切，面貌不與滬、澳兩館（《時務報》館、《知新報》館）相符，暗中聲氣必須相通」。<sup>38</sup>直到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葉瀚等尚未放棄創辦《民聽報》的計畫，但困難重重。他訴汪康年說：

《民聽（報）》事，《漢報》難盤，現欲獨創。見吳鐵樵（吳樵，字鐵樵），詢渠意欲掛美商招牌，以避阻力，主炸彈下擊，以生黃種。先之曰《學報》，以聳士夫之聽，藉為張羅；然後再名為《民聽》，附《學報》，大開圍場。不過《民聽》專主譯報，恐愚氓難喻，其一；欲言政而不犯貴報之學，而不襲《澳報（知新報）》、《農學（報）》各報，而仍欲人人喜看，其難又一；且洋商不一，恐始輕許而後阻難，又其一。<sup>39</sup>

葉瀚共提出三個困難，前兩者均說明報館分工之難。葉瀚等人籌備報館，很注意與其他報館的合作和分工，但在已有幾種先行報刊的情況下，葉瀚等人又要考慮市場所需，故很難突出自家的個性。<sup>40</sup>創辦《民聽報》的計畫，最終未能實現。<sup>41</sup>後來葉瀚等人到

<sup>37</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一）》，〈吳樵·二十七〉，頁517。關於這個想法，吳樵說「樵意與浩（葉瀚）意兩別也」。

<sup>38</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一）》，〈吳樵·二十九〉，頁524。葉瀚也說「鐵樵（吳樵）在此，擬盤據《漢報》館，合之澳門，將成三鼎足之勢」。參見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六〉，頁2608。

<sup>39</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三十五〉，頁2577-2578。

<sup>40</sup> 如何突出自家報刊的個性？則為當時很多辦報人士共同面對的問題。比如，杭州《經世報》因其政論性報刊的性質與《時務報》很像，地理位置又與報館林立的上海很近，故很難突出其獨立性。參見徐佳貴，〈維新、經世與士人辦報——以杭州《經世報》（1897-1898）為個案再論維新報刊史〉，頁113。比較成功的是湖南《湘學報》。它有不談政策、只研究實學的明確辦報方針，而且在地理位置上離上海較遠，有自己的地盤。此兩點為《湘學報》的推廣帶來了積極影響。參見八百谷晃義，〈《湘學報》的經營、流通以及其在維新運動史上的位置〉，頁68-71。

上海擁有自己的報刊時，作為主題選擇了「蒙學」這一領域，除了葉瀚一向對此領域感興趣之外，也與對報刊分工的考慮有關。

葉瀚在武昌時，也計畫過創辦學會。他擬辦的學會名目有內地游歷學會、中西博聞學會以及政學博聞社等，<sup>42</sup>最終似均未辦成，其擬辦的活動內容也未詳。只是名稱中有「游歷」、「博聞」等字，葉瀚又在內地游歷學會的介紹中指出「內地學會或講習農、工、礦冶三項，著書立說以先之，開學造才以繼之，餘則再講求文學，以期成才日眾」，<sup>43</sup>由此可以推測，葉瀚等人擬創辦的學會以推廣新知識為主要任務，而先「著書立說」，後「開學造才」的模式，與後來的蒙學公會有共通之處。

如上所述，葉瀚在張之洞幕府的主要任務是編洋務書，透過葉瀚給汪康年的書信，可知葉瀚此時對翻譯工作研究頗深，同時為自己的翻譯事業與擬辦的報刊物色翻譯人才。比如，光緒二十二年初葉瀚寫長信跟汪康年討論湖北譯局應翻譯何種書籍；<sup>44</sup>為《時務報》推薦法文翻譯柯鴻年（1867-1929），<sup>45</sup>也想將之留下來為《民聽報》當翻譯。<sup>46</sup>

開辦學堂也是葉瀚頗為關注的事業，上文已述曾在杭州時計畫開辦「蒙塾」。葉瀚在赴武昌時，雖在兩湖書院任時務助教，但對書院現狀頗為不滿。<sup>47</sup>光緒二十三年初，因創辦《民聽報》的

<sup>41</sup> 葉瀚在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97.2.18）的信上跟汪康年說，「此間民報一局，大致群情觀望，終不能成」。參見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四十〉，頁2586。

<sup>42</sup> 葉瀚計畫創設此種學會，大概是在光緒二十二年秋冬間。葉瀚談到計畫創設學會之處，參見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二十一〉、〈葉瀚·二十二〉、〈葉瀚·二十三〉、〈葉瀚·二十六〉、〈葉瀚·三十三〉，頁2553、頁2555、頁2556、頁2563、頁2574。

<sup>43</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二十二〉，頁2555。

<sup>44</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十〉，頁2536-2538。

<sup>45</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二十五〉，頁2561。

<sup>46</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三十八〉，頁2582-2583。柯鴻年是葉瀚頗為中意的翻譯人才。葉瀚與柯鴻年一起翻譯過法文《比較商法》一書（光緒二十三年春譯就）。參見葉瀚，〈塊餘生自紀〉，頁483。

<sup>47</sup> 葉瀚，〈塊餘生自紀〉，頁483-484。

事業未能順利完成，葉瀚將事業的重點移至在上海開辦學堂之事上。葉瀚在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97.2.18）寫給汪康年的信中提到在上海與沈翊清（1855-約1928）、柯鴻年等人開辦學堂、兼辦譯書的計畫，認為若能辦成，不僅可以造成人才，亦為《時務報》館助力。葉瀚擬「在鄂了南皮（張之洞）三年相待之誼，徐圖抽身」，表示願赴上海發展，參與學堂事業的願望。<sup>48</sup>後來，汪康年也同意葉瀚的計畫。<sup>49</sup>旋後大概在同年二月，葉瀚與汪康年再次談及學堂與《時務報》館合作的辦法，提出兩個要點：一為「以結實認事之同志為譯人」，提高報刊質量；二為「自設石印機器」，以便減省經費。葉瀚謂：

頃我輩欲在上海開設學堂，沈君逋梅（翊清），英文優長，而辦理諸事尤極精細老當。柯君貞賢（鴻年）法文，為公（汪康年）所知，渠在武昌，不得行其志，亦有去意，聞我等議開學堂，意極欣從。有此二人，將來可為貴報之助。尤可喜者，沈君議在學堂之外添設石印書局。今議學堂、書局，我等皆有存股石印一局，即首以承印《時務報》為主。……假如公允俯助，則學堂即名曰時務學堂，書局即名曰時務石印局，以示彼此一家，不分畛域。<sup>50</sup>

葉瀚提出此種建議，似有以自己人包辦承印《時務報》事，分潤《時務報》館生意的想法，但仍然可以看出，他打算在與《時務報》館的合作下，興辦以報館、學堂和書局合為一體之事業，同時也可以說，因「在武昌，不得行其志」而有「去意」者，實含葉瀚本人在內，其赴上海發展的想法也愈來愈明顯。

如上所述，在蒙學公會成立前，葉瀚籌劃過好幾種事業，雖然這些計畫在杭州、武昌均未辦成，但或多或少都與葉瀚後來的

<sup>48</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四十〉，頁2586。

<sup>49</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四十一〉，頁2587-2588。

<sup>50</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四十二〉，頁2590-2591。此函大概寫於光緒二十三年二月，據函中提到該年二月初一日（1897.3.3）發行的《時務報》第19期。

發展有關。葉瀚後來回憶道，「丁酉（光緒二十三年）秋，予與鄂省當局者忤，辭歸滬」。<sup>51</sup>葉瀚離開武昌的直接起因，似此年由兩湖書院的兩位監督，即講中學之東監督梁鼎芬（1859-1919）與講西學之西監督蒯光典（1857-1911）之間的矛盾所引起的學堂「風潮」。葉瀚被捲入其中，遂以「避地」為藉口，最終離鄂赴滬。<sup>52</sup>葉瀚對武昌的風氣頗為不滿，謂「顧其時，武昌風氣錮蔽，尤甚於蘇、杭，除飲酒賦詩外，無他事可言者」。<sup>53</sup>葉瀚所謂「風氣錮蔽」，多少包含對張之洞的不滿。據黃紹箕（1854-1908）所稱，在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左右，他與錢恂、姚錫光（1857-?）、葉瀚等人擬在武昌興辦學會，擬援京師官書局之例，以書局為名。<sup>54</sup>不過張之洞以黃紹箕即將進京、錢恂與姚錫光公事頗忙、惟有葉瀚一人不能獨理等三項理由，用「各自攷求，隨方聯絡，遙為聲援」之三言勸阻。黃紹箕等雖「此事志在必成」，但只能「暫且不開辦」。<sup>55</sup>京師官書局的成立與甲午戰敗後的官紳政治行動頗有關係。光緒二十一年底由康有為等人籌劃的京師強學會，因恐招來非議，成立時將名稱改強學書局，不過仍然未能避免「結黨營私」的嫌疑，為御史楊崇伊（1850-1909）所劾，奉旨封禁。後於光緒二十二年初，因有御史胡孚宸（1846-1910）奏請，清廷將強學書局改官書局，派工部尚書孫家鼐（1827-1909）管理。<sup>56</sup>張之洞不讓

<sup>51</sup> 葉瀚，〈葉景萊行略〉，《神洲日報》（上海），1909年11月26日，頁4。

<sup>52</sup> 葉瀚，〈塊餘生自紀〉，頁483-484。兩湖書院東監督梁鼎芬與西監督蒯光典同事期間關係一直不洽，參見蘇雲峯，《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頁67-69。此時在梁鼎芬與蒯光典之間發生的爭論，參見陸胤，〈清末兩湖書院的改革風波與學統之爭〉，《史林》，2015：1（上海，2015.2），頁93-95。

<sup>53</sup> 葉瀚，〈塊餘生自紀〉，頁480。

<sup>54</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黃紹箕·七〉，頁2303。

<sup>55</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黃紹箕·八〉，頁2305。

<sup>56</sup> 京師強學書局被劾和官書局成立的經過，參見八百谷晃義，〈清末變法運動期における学会の政治的活動〉，頁39。京師強學會因回避使用「會」字，實際上改以強學書局之名成立。參見汪叔子，〈京師強學書局考〉，收入方志欽、趙立人、林有能主編，《康有為與戊戌變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學術研究雜誌社，1999），頁189-204；閻小波，〈強學會與強學書局考辨〉，收入王曉秋主編，《戊戌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戊戌維新一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265-277。

黃紹箕等人模仿京師開辦書局，是否考慮到了強學書局曾因有「結黨營私」的嫌疑被劾，就現有的史料而言，難以知曉。但至少可以判斷，葉瀚等人在武昌舉辦現代化事業，必須經過張之洞同意後才可以付諸實施。張之洞當然是葉瀚等人在武昌推進現代化事業的後盾，但同時也會影響到事業的具體內容。葉瀚等人設立蒙學公會，需要的是滬上相對自由的環境。

### 三、蒙學公會的事業

#### （一）蒙學公會的組織結構與《蒙學報》的發行

葉瀚自光緒二十三年秋赴上海後，與汪鍾霖（1867-1933）、汪康年等人討論開學會事宜，遂於光緒二十三年九、十月間成立蒙學公會。<sup>57</sup>在上海可以當面交流，故此後，葉瀚在寫給汪康年的書信中甚少直接談到蒙學公會的籌備工作。在此只引一例。葉瀚在九月時因「辦杭中款事」，暫且離滬回家，於九月十四日（1897.10.9）與汪康年寫信討論籌備《蒙學報》事。據此函可得知三點重要信息：第一，葉瀚謂「弟大約總須月杪方得返滬，局中自有甘卿（汪鍾霖）處置，弟亦放懷」，由此可知蒙學公會除了葉瀚以外，汪鍾霖也是核心人物，葉瀚不在滬時，由汪鍾霖主持全局；第二，如葉瀚說「敝會既與尊館相比，一切總仰吾兄主持，弟等絕不自參異見」，或離滬時「諄屬（汪鍾霖）函求吾兄指教主持一切」等，葉瀚依然很重視與《時務報》館的合作，一

<sup>57</sup> 關於蒙學公會正式成立的時間，蘇松太兵備道蔡鈞於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十日（1898.4.30）發布禁止翻印《蒙學報》告示，內中有「上年十月，寓滬官紳捐資創設蒙學公會」等語。參見蔡鈞，〈諭示〉，《蒙學報》，19（上海，1898.4），頁1。蒙學公會於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十二日（1897.11.6），在《新聞報》頭版刊登〈告白〉，簡單說明創刊《蒙學報》的目標與購閱方式。參見蒙學公會，〈《蒙學報》館告白〉，《新聞報》（上海），1897年11月6日，頁1。由此可見，蒙學公會在此年十月中旬已開始正式運作。下文所引〈蒙學公會公啟〉發表於《時務報》第42期。該冊在封面上所署的刊行時間為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1897.10.16）。不過根據當時報刊的實際刊行時間往往晚於封面刊期（據《新聞報》的〈《蒙學報》館告白〉可知，《時務報》第42期最晚在十月十二日時已出刊），因此筆者無法確定蒙學公會在九月底是否已經開始正式運作。

切都向辦報經驗豐富的汪康年徵求意見；第三，葉瀚與汪康年討論翻譯東、西文的人才，擬延請藤田豐八（1869-1929）、古城貞吉（1866-1949），分別翻譯西文與日文。由此可知，《蒙學報》刊登譯自東、西文的文章之基本結構，此時已經確定。<sup>58</sup>

葉瀚、曾廣銓（1871-1940）、汪康年、汪鍾霖在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1897.10.16）的《時務報》第42冊上，發表了〈蒙學公會公啟〉。<sup>59</sup>該文由「立會本旨」與「蒙會學報簡章」兩部分構成。據「立會本旨」稱：

蒙養者，天下人才之根柢也。根本不正，萌芽奚遂？是以屯難造物，受之以蒙，聖經遺制，規利宏遠。某等痛憤時難，恐善良種子，播棄蕾落，受人蹂躪，用是仰體聖心，立為蒙學公會，務欲童幼男女，均沾教化為主。

蒙學公會擬辦之事業有以下四項：

一曰，會。連天下心志，使歸於群，相與宣明聖教，開通錮蔽也；

一曰，報。立法廣說，新天下之耳目，而為蒙養之表範也；

一曰，書。為圖器、歌誦、論說，便蒙養之誦習，而濬其神智也；

一曰，學。端師範、正蒙養、造成才，必兼賅而備具也。<sup>60</sup>

蒙學公會擬從事組織學會、發行報刊、出版書籍和創辦學堂四大事業，其具體狀況，筆者將在下文詳述。值得注意的是，四大事業的構想與實際行動，在葉瀚等人的早期活動中，亦處處可見。

<sup>58</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五十〉，頁2596-2597。

<sup>59</sup> 蒙學公會，〈蒙學公會公啟〉，《時務報》，42（上海，1897.10），收入《中國近代期刊彙刊 強學報·時務報》（北京：中華書局，1991），第4冊，頁2903-2908。

<sup>60</sup> 蒙學公會，〈蒙學公會公啟〉，《時務報》，42（上海，1897.10），收入《中國近代期刊彙刊 強學報·時務報》，第4冊，頁2903。

蒙學公會的四大事業中，成就最大的當屬報務。《蒙學報》館於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十二日（1897.11.6），在上海《新聞報》上登出廣告，預告《蒙學報》將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1897.11.24）創刊，並向讀者介紹訂閱辦法。<sup>61</sup>由此可見，在該年十月初時，蒙學公會發行報刊已經提上具體日程。另外，在此則廣告標題上學會名稱為「《蒙學報》館」，但在內文中又稱為「本公會」，此混淆現象說明蒙學公會當初是以報館的身分開始運作。蒙學公會的運作與《蒙學報》的發行，實則互為表裡。

《蒙學報》第1期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出刊。《蒙學報》在創刊時月出4冊，年出44冊，<sup>62</sup>後自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1898.6.29）的第26冊起改旬刊。<sup>63</sup>創刊時的核心團體為：總董汪康年、總理汪鍾霖、總撰述葉瀚、總翻譯曾廣銓、東文翻譯古城貞吉、總圖繪葉耀元、撰述·刪校葉瀾。<sup>64</sup>總董汪康年還要主持《時務報》，對《蒙學報》編輯工作的參與度不會很高，因此可以說《蒙學報》的報務實際由汪鍾霖主持，報刊自撰內容基本由葉瀚、葉瀾兄弟提供，東、西文翻譯分別由古城貞吉、曾廣銓負責。自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三日（1898.4.13）出刊的第20期起，王季烈（1873-1952）也佐理撰述工作。<sup>65</sup>

《蒙學報》刊載的內容有「文學」、「算學」、「智學」、「史事」、「輿地」和「格致」六類，自第1期至第7期為止，教法分「自五歲至七歲為一界，自八歲至十二歲為一界」，報後「附專書，文理稍深，以便十二歲以上童子誦讀」。<sup>66</sup>自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1898.2.13）的第8期起，分為「五歲至八歲用」的上編與「九歲至十三歲用」的下編之框架，增加「衛養」類。<sup>67</sup>

<sup>61</sup> 蒙學公會，〈《蒙學報》館告白〉，《新聞報》（上海），1897年11月24日，頁1。

<sup>62</sup> 蒙學公會，〈本館告白〉，《蒙學報》，1，頁56。

<sup>63</sup> 蒙學公會，〈本館告白〉，《蒙學報》，25（上海，1898.6），頁3。

<sup>64</sup> 蒙學公會，〈辦事諸君姓氏〉，《蒙學報》，1，頁55。

<sup>65</sup> 蒙學公會，〈辦事姓氏〉，《蒙學報》，20（上海，1898.4），頁4。

<sup>66</sup> 蒙學公會，〈《蒙學報》條例〉，《蒙學報》，1，頁12-13。

<sup>67</sup> 蒙學公會，〈本報釋例〉，《蒙學報》，8（上海，1898.2），頁3。

自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1898.6.29）發行的第26冊後，與改刊期的同時《蒙學報》調整了期刊框架，分上、中、下之三編：上編為「三歲至十歲用」；中編為「十一歲至十三歲用」；下編為「十四歲至十六歲用」，刊載因應經濟特科的「經學問答」、「史學問答」、「經濟策問」以及「身體衛生論」、「蒙學博議」等內容。<sup>68</sup>

葉瀾在該報第1冊上發表〈《蒙學報》緣起〉，詳細說明《蒙學報》的目標。葉瀾認為，中國教育童蒙之法有嚴重的問題，因此家長愈認真按這個方法教子弟，反而愈禍害子弟，因為其教學內容僅限於《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無法培養童蒙對生活世界的知識。尤其對農、工、商賈之家來說，他們本不願子弟應考做官，但中國尚無培養其專業知識的辦法。然而，「若夫東、西各國之教幼童也，則不然。吾雖未諳東、西文字，固嘗讀新會梁啟超氏之論矣」。據梁啟超所論，西方與日本的教育方式有次第，不會躐等；與只注意應考的中國不同，其所教內容包含天文地理、歷史、外國語言、算學，甚至音樂、體操等也在內，不僅可以讓人成為合格的「士」，即使「其欲為農、若工、若商、若兵者，亦可以略識天地人物之理、古今中外之蹟，其學足以為仰事俯畜之資，稍加閱歷，而即可以致富貴。故用力少而畜德多，數歲之功，而畢生受其用也」。<sup>69</sup>葉瀾所謂「新會梁啟超氏之論」，是梁啟超發表於《時務報》的「變法通義」系列文章，

<sup>68</sup> 蒙學公會，〈《蒙學書報》第二十六冊目錄〉，《蒙學報》，26（上海，1898.6），頁3。《蒙學報》調整期刊框架是為了因應經濟特科，參見蒙學公會，〈本館告白〉，《蒙學報》，25，頁3。戊戌政變後，因經濟特科與其他改革措施一起被停罷，〈經濟策問〉自第34冊起暫停刊登。參見《蒙學報》，33（上海，1898.10），頁4。

<sup>69</sup> 葉瀾，〈《蒙學報》緣起〉，《蒙學報》，1，頁6-11。王汎森謂，「晚清出現一種『四民皆士』的概念，認為理想的現代國家，『士』不是一小群讀書應考者的專稱，所有人民都應該受教育」，逐漸形成有關農、工、商、兵的知識也是學術重要組成部分的認識。參見王汎森，〈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收入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增訂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8），頁305-309。此處葉瀾所據梁啟超的討論，也在此種「四民皆士」論的系譜上。

如〈論學校一·總論〉，連載於《時務報》第 5-6 冊；〈論學校五·幼學〉，連載於第 16-19 冊。可見，葉瀾等人構想蒙學公會的理念時，很明顯受了梁啟超的影響，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蒙學報》的實踐，並非完全按照梁啟超的構想。

梁啟超的〈論學校五·幼學〉指出中國現今的童蒙教育上存在嚴重問題後，著力提倡採納與中國古意符合的西方教育方式，並以中國現有的思想資源與有限的翻譯書為材料，「盡取天下蒙學之書而再編而再教之」。需要編輯的蒙學書有七種，即「識字書」、「文法書」、「歌訣書」、「問答書」、「說部書」、「門徑書」與「名物書」。<sup>70</sup>或許因為是鼓吹引進西方教育法的文章，梁啟超此文的基調頗為樂觀，好像只要按其所說教育童蒙，即可一掃國中愚人，令人覺得過於「天真」。關於中國童蒙教育的弊端與克服方法，葉瀾的〈《蒙學報》緣起〉基本持與梁啟超一樣的看法，但西方的教育方法如何在中國實踐？關於這一點，葉瀾的確看到了難處。漢字與西方字母性質不同，因有「識字之難」；中文有文白之分，而且各種文體都有自己的文法，沒有統一的標準，因有「文法之難」；中國無可靠的地圖，看地圖也無法知道經度、緯度以及高度，往往方向也無法辨別，因有「考輿地之難」；中國的書大部分沒有附圖，即使在書中看到動植物的名字，若沒有看到實物，則無從知道其所指為何，而且在翻譯書中的名稱，亦皆譯用西方的名稱，未審係中國何物，因有「指稱名物之難」。<sup>71</sup>如上所述，早在蒙學公會成立之前，葉氏兄弟一直對童蒙教育抱有關懷，也做過撰寫《天文地理歌略》等實踐。在此種思考和實踐中，葉瀾等人總結出了四個難處，可以說葉瀾的〈《蒙學報》緣起〉雖未能完全突破梁啟超的大框架，但若放眼

<sup>70</sup> 有關編書的內容參見梁啟超，〈變法通義·論學校五·幼學〉，《時務報》，17（上海，1897.1），收入《中國近代期刊彙刊 強學報·時務報》，第2冊，頁1106-1110；梁啟超，〈變法通義·論學校五·幼學〉，《時務報》，18（上海，1897.2），收入《中國近代期刊彙刊 強學報·時務報》，第2冊，頁1173-1176。

<sup>71</sup> 葉瀾，〈《蒙學報》緣起〉，《蒙學報》，1，頁10。「考輿地之難」原作「考輿地之圖」。從前後文來判斷，「圖」字似為「難」字之誤。

具體的討論，的確有比梁啟超更高明的地方。

對於《蒙學報》刊載的蒙學內容，本文未能展開深入的梳理與分析，在此根據先行研究略作說明。梅家玲認為《蒙學報》的蒙學實踐是「依違於理念與實踐、中學與西學、傳統與現代之間，晚清童蒙教育在各方不斷對話的過程中，一路摸索行進的艱難歷程」。比如，葉瀚受到康有為、梁啟超的啟發，試圖將「藉由『小說』來進行歷史教學」的「新的嘗試方向」落實到實踐中，努力將傳統「史論」改變為適合童蒙的說部「演義」式歷史敘述。葉瀚自《蒙學報》第10冊起刊載的〈中朝古代通史演義〉，效仿章回小說的形式，純用白話撰寫，可謂是葉瀚付出努力的成果。<sup>72</sup>陸胤指出《蒙學報》「讀本書」欄目的實踐，實則反映了《蒙學報》取法對象由西方至日本的轉換，和在本土資源的基礎上結合外國經驗的嘗試。<sup>73</sup>陳旭亦分析《蒙學報》刊載的〈伊索寓言〉，注意到《蒙學報》刊載的文本雖參考了作為先行譯本的〈意拾寓言〉，但《蒙學報》的文本呈現「從初期的較為直接的引用到能反映出作者具有一定的改寫意識的一系列小幅度的改動，再到最後較為成熟的改寫」之變化，可謂是「一個學習到實踐再到超越的過程」。<sup>74</sup>這些先行研究均說明，《蒙學報》將蒙學實踐提升到梁啟超的「紙上談兵」無可企及的高度。

由政治史脈絡看，作為蒙學公會與《蒙學報》的重要特點，它的公開性在此值得一提。中國歷來有「君子不黨」的觀念，在此觀念下，若有一致政治主張或共同利益的人士組成了派別，常被視為「結黨營私」，即使是無明確政治取向的團體也會招來非議，雖到晚清時期也是如此。比如，身處北京的張元濟（1867-1959）於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1897.6.15）給汪康年寫信，對上海不纏足會〈簡明章程〉中公開刊刻會籍的規定，謂「不纏足會

<sup>72</sup> 參見梅家玲〈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傳譯、知識結構與表述方式——以《蒙學報》與《啟蒙畫報》為中心〉，頁40、頁49-51。

<sup>73</sup> 參見陸胤，〈「普通國文」的發生——清末《蒙學報》的文體試驗〉，頁133-138。

<sup>74</sup> 陳旭，〈關於近代報刊中的漢譯伊索寓言研究——以《蒙學報》為中心〉，《或問》，36（吹田，2019.12），頁93-103。引文出自頁101。

意思極佳，然刊冊選董，毋乃過事張皇。此日人智漸開，貴報（《時務報》）更剴切言之，自能令人興起矣」。<sup>75</sup>成立於光緒二十四年三月的湖南不纏足會早在光緒二十三年冬天已經開始醞釀，事先公開核心成員的名單。<sup>76</sup>皮錫瑞（1850-1908）於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1897.11.16）看到不纏足會名單，在日記中寫道「不纏足會已出簿，人多怪駭阻撓。少見多怪，人之常情。予亦欲入此會，不顧俗議也」。<sup>77</sup>由此可見，雖然是無明確政治取向的不纏足運動，但它若以公開團體的面貌出現，還是引來不少非議。不過，維新運動時期的學會組織，逐漸擺脫「君子不黨」觀念的束縛，開始公開自己的組織結構與成員。此乃說明參與學會運動的士紳，對新的活動方式逐漸有自信心。<sup>78</sup>蒙學公會於光緒二十三年冬成立，此時已有上海不纏足會在《時務報》上刊登董事與助款者名單、農學會在《農學報》上刊登會員與助款者名單的先例，蒙學公會亦在《蒙學報》上公開刊登會員與助款者名單，係滬上學會運動的風氣使然。<sup>79</sup>蒙學公會在推廣《蒙學報》或學堂等事業時，也積極使用報刊等新媒介進行宣傳，如上所述，蒙學公會在即將要成立時，就在《新聞報》上刊登廣告，以後有關於《蒙學報》的發行以及設立學堂等事宜，均透過報刊公布。<sup>80</sup>因此

<sup>75</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張元濟·十二〉，頁1695。上海不纏足會公開刊刻會籍的規定，參見梁啟超，〈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時務報》，25（上海，1897.5），收入《中國近代期刊彙刊 強學報·時務報》，第2冊，頁1665。

<sup>76</sup> 湖南不纏足會成立前後的狀況，參見八百谷晃義，〈湖南不纏足會と変法運動〉，頁63-69。

<sup>77</sup> 清·皮錫瑞著，吳仰湘點校，《皮錫瑞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第2冊，頁524。湖南不纏足會的名單，參見湖南不纏足會，〈湖南辦理不纏足會姓名〉，《湘學報》，24（長沙，1897.12），頁58-59。

<sup>78</sup> 關於維新運動時期學會公開性的討論，參見八百谷晃義，〈清末変法運動期における学会の政治的活動〉，頁44-46。

<sup>79</sup> 比如蒙學公會，〈蒙學會友題名錄〉，《蒙學報》，1，頁53-54；蒙學公會，〈集款姓氏〉，《蒙學報》，1，頁56。

<sup>80</sup> 比如，《蒙學報》館因第1冊樣本脫誤尚多，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1897.11.26）的《新聞報》上公告讀者可致報館補換校改後的版本。參見蒙學公會，〈《蒙學報》館告白〉，《新聞報》（上海），1897年11月26日，頁1。《蒙學報》在過年時期暫停一個月，也在《新聞報》上公告。參見蒙學公會，〈《蒙

可以說，蒙學公會推廣事業，除了透過官紳間現成的人際關係以外，還積極使用報刊媒介的公共輿論空間。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葉瀚尚在武昌時為自己的事業籌款，基本透過私人關係網，但在上海，他們已經擁有了學會與報刊這種新的工具，可以透過公開的方式集款；學會、報刊等新工具，為趨新人士的事業帶來了新的運作方式。

在此，本文使用《蒙學報》刊登的會員名單，對蒙學公會會員的結構做簡單分析。在筆者使用的網路資料庫「全國報刊索引」所收入的《蒙學報》上，發表〈題名錄〉的有第1-10、12、15、16、19-21、23、24、26-28期，共21期，經統計，共得120名會員（參見本文附表）。蒙學公會〈題名錄〉所提供的信息為姓名與字號、籍貫以及功名或職位。比如，第1期〈題名錄〉第一位汪鍾霖的信息為，「汪鍾霖，字泰雲，江蘇吳縣人，癸巳舉人」。<sup>81</sup>

首先看會員的籍貫。蒙學公會會員中人數最多的是江蘇籍人士，共46名；其次是浙江籍人士，共37名；以下依次為廣東籍11名；安徽籍9名；江西籍6名；湖南籍4名；四川籍3名；福建籍2名；滿洲1名；湖北籍1名。其中江浙兩省人數為83名，在全體會員中所占比率約為69.2%。另，《蒙學報》辦事諸君中，總董汪康年、總撰述葉瀚和撰述·刪校葉瀾為浙江籍；總理汪鍾霖、總繪圖葉耀元和後來加入的撰述王季烈為江蘇籍；總翻譯曾廣銓為湖南籍；東文翻譯古城貞吉為日本籍。由此可說，蒙學公會是以江浙地區人士為核心的學會，其機關報《蒙學報》，也以江浙人士為核心力量。

其次，分析會員功名、職位等社會身分。針對這一點，蒙學公會〈題名錄〉並未能提供完整的信息。例如，各會員的功名和職位只填一項，似是職位優先。職位有的是填缺，有的是填差。

---

學報》館告白》，《新聞報》（上海），1898年1月11日，頁1。關於設立學堂的廣告，詳於下文，在此不贅。

<sup>81</sup> 蒙學公會，〈蒙學會友題名錄〉，《蒙學報》，1，頁53。

部分會員的職位，如候選訓導等，並非實缺，且品級也很低，若無法知道其功名等其他身分，很難準確判斷其社會地位。如果要對蒙學公會會員的社會身分做準確的分析，必須結合會員傳記史料加以研究，不過筆者尚無充分的材料做此分析，因此此處只能做極粗糙的描述。

在會員的社會身分中，因有《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可供對照，<sup>82</sup>能獲較確切訊息的是進士人數。筆者將在會員名單上填進士身份者和可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查到進士身分者的人數相加，共有 11 名持有進士功名的會員，在全體會員中所占比率約為 9.2%。填舉人的會員有 14 名，在全體會員中占的比率約為 11.7%。將廩生、附生以及貢生等各名目都視為生員進行計算，<sup>83</sup>填生員身分的會員共計 27 名，在全體會員中所占比率為 22.5%。填有職位的共 57 名，在全體會員中所占比率為 47.5%。要注意的是，除了正三品順天府尹胡燏棻（1840-1906）、<sup>84</sup>以正七品翰林院編修任湖南學政之差的江標（1860-1899）<sup>85</sup>等各別會員有較高的地位以外，其他基本都是低級官員，其中 26 名為候補、候選等非實缺人員。而填內閣中書、六部主事、郎中以及各省地方官的會員中，除了湖北房縣知縣歐陽煊和安徽即用知縣湯壽潛（1856-1917）<sup>86</sup>以外，似均無進士功名，故其職位很有可能以捐納獲得。最後，未

<sup>82</sup>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sup>83</sup> 填寫貢生身分的會員有 3 名，即廩貢生汪詒年、沈毓慶（1868-1902）與附貢生胡惟志。廩貢與附貢均係不經考試，不論年資，以捐納獲得者，與作為正途的五貢不同，參見劉兆瓚，《清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9），頁 19。因此，在此將其算在生員中一併計算。

<sup>84</sup> 順天府尹為正三品，參見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116，〈職官三〉，頁 3333。

<sup>85</sup> 江標在任湖南學政時為翰林院編修（後光緒皇帝於光緒二十四年夏特命江標以四品京堂候補在總署章京上行走），參見唐才常，〈前四品京堂湖南學政江君傳〉，收入清·江標著，黃政輯，《江標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頁 480-481。翰林院編修為正七品，參見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卷 115，〈職官二〉，頁 3309。

<sup>86</sup> 歐陽煊為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第二甲第四十一名；湯壽潛為光緒十八年（1892）壬辰科第二甲第十一名。參見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下冊，頁 2823；同書，下冊，頁 2852。

填寫任何功名、職位的會員也有 21 名，在全體會員中所占比率為 17.5%。雖是極粗略的統計，但由此大致可以了解，蒙學公會會員缺少高級官員，具有高級功名的會員如進士等也不多，占比最大的是生員或以捐納獲低級職位者，在傳統的士紳階層中處於中下層地位的人物。

在此，筆者還要提及，蒙學公會與《時務報》館、農學會的關係。在上文已屢次談到蒙學公會特別重視與《時務報》館的合作和分工。除了《時務報》館以外，與蒙學公會有密切關係的，還有發行《農學報》的農學會。<sup>87</sup>農學會於光緒二十二年冬成立，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創辦《農學報》。《農學報》的版式、刊登農學會會員名單以及助款者名單的方式，幾乎與《蒙學報》別無二致。農學會將江浙兩省設定為活動地區，<sup>88</sup>與蒙學公會一樣，是以江浙人士為中心的學會。同時加入農學會與蒙學公會的人士，亦有 41 名。<sup>89</sup>另外，《時務報》、《農學報》與《蒙學報》一起登載廣告，也是常見的事。<sup>90</sup>葉瀚於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四日（1898.6.22）與汪康年寫信說道，「農、蒙二會實在關係我族性命

<sup>87</sup> 關於農學會與《農學報》，參見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頁378-388。

<sup>88</sup> 農學會在〈務農會公啟〉上說，「本會籌集款項，在江浙兩省地方購田試辦」。見農學會，〈務農會公啟〉，《時務報》，13（上海，1896.12），收入《中國近代期刊彙刊 強學報·時務報》，第1冊，頁891。

<sup>89</sup> 筆者使用《農學報》自創刊至戊戌政變發作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之間刊載的務農會會員名單統計，共得317名會員。在此期間，《農學報》共出45冊。筆者使用的是「全國報刊資料」電子資料庫所收入的《農學報》，「全國報刊資料」的《農學報》缺第17、45冊，第20、21、23、27、29、31、33、36-39、41、42、44冊未刊登會員名單。參見「全國報刊索引」電子資料庫，〈<https://www.cnbkys.com/home>〉（2021/1/21）。

<sup>90</sup> 比如，《時務報》、《農學報》與《蒙學報》在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6.15）的《申報》上一起登載廣告。參見《時務報》館等，〈《時務》／《農學》／《蒙學》報館告白〉，《申報》（上海），1898年6月15日，頁2。如下文所述，為了順利收取報費，三家報館施行統一的辦法。參見蒙學公會，〈本館告白〉，《蒙學報》，23（上海，1898.6），頁3。另外，下文所述的蒙學公會學堂章程的領取處，也是這三家報館。

之本，不可不立為維持，以期永久」。<sup>91</sup>由此可知，在葉瀚心中，農學會、蒙學公會的存在和兩會的合作關係至為重要。此種跨學會的合作關係，後來在葉瀚等人的行動逐漸政治化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 （二）《蒙學報》以外的事業

除了報刊以外，蒙學公會還有三種事業：組織學會、出版書籍和創辦學堂。關於組織學會，蒙學公會在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97.12.16）發行的《蒙學報》第4期上告白說道，「本館書、報為先，會、學後起。但學會之名已立，原欲廣集通才，商略新法，為斯世童蒙造福」，但在當時只做到令讀者函告感興趣的教學良法由公會代為翻譯，以及徵求讀者投稿。<sup>92</sup>如下文所述，後來蒙學公會將學會運作與報刊發行分開，前者隨之雲散，因此蒙學公會為了「斯世童蒙」而「廣集通才，商略新法」的初衷，最終未能實現。

關於書籍出版，除了蒙學公會自印，或代印、代售蒙學書籍以外，<sup>93</sup>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蒙學報》亦書亦報，作為「分卷成書的預備階段」性質。<sup>94</sup>《蒙學報》創刊伊始，就告白說「本館函購東、西文書報，為日甚促，致未到齊。刻因同志紛紛購閱，故趕出報，先譯數種。尚有數十種極便蒙學之書，一竣購到，即行譯登」，<sup>95</sup>似將出報的最終目的定為積稿成書，或至少可以說，視刊

<sup>91</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五十三〉，頁2599。

<sup>92</sup> 蒙學公會，〈本館告白〉，《蒙學報》，4（上海，1897.12），頁42。

<sup>93</sup> 比如，蒙學公會在第4期告白表示願意代售、代印「名人著述及自刊之圖籍、器具」。參見蒙學公會，〈本館告白〉，《蒙學報》，4，頁42。在報上也常見代售書籍的廣告，如第10期中代售江標輯《西書通考》的廣告。參見蒙學公會，〈寄售《西書通考》〉，《蒙學報》，10（上海，1898.2），頁44。蒙學公會自印的書，有葉瀚、葉瀾《天文地學歌略》，和葉瀚《初學讀書要略》等。參見蒙學公會，〈本館告白〉，《蒙學報》，7（上海，1898.2），頁51；蒙學公會，〈本館出售書目〉，《蒙學報》，10，頁44。

<sup>94</sup> 維新運動時期報刊作為「分卷成書的預備階段」，是徐佳貴在《經世報》研究中提出的看法。參見徐佳貴，〈維新、經世與士人辦報——以杭州《經世報》（1897-1898）為個案再論維新報刊史〉，頁117-120。

<sup>95</sup> 蒙學公會，〈本館告白〉，《蒙學報》，1，頁56。

載內容重編成書為順理成章的事。在第2期，汪大鈞（1862-1906）對《蒙學報》體例提意見調，「報後附蒙學書若干頁。如〈啟蒙字書〉之類，皆作專書，不必入報。既係著書，即依著書之例，不必過俚也」，<sup>96</sup>即建議將應是「專書」的內容抽出，單獨附報後，以完善體例。對汪大鈞的建議，蒙學公會似未做過回應。《蒙學報》在第6期介紹讀者來信，其中一條為，「來書有謂，本報每期一頁與下期續印，往往文意未完，令人意興易盡者，本館亦無可如何。謹當再集同志續議各法，俟議定後再行布告」。<sup>97</sup>上述兩位讀者提出的問題，則為維新運動時期的報刊所共有，蒙學公會一時也無法解決。在當時，讀者按自己的需要將報刊拆線重訂，也是常見現象。<sup>98</sup>《蒙學報》自光緒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99.3.2）發行第40冊起，在封面頁告白說，「本館之設，專便童蒙，故報中輯譯諸稿，俱可按期抽訂，以作學堂讀本」，<sup>99</sup>這是更直白的表達。如下所述，在光緒二十五年初時，《蒙學報》業已透過人事與組織架構的變動改出新報，但此種「可按期抽訂」的性質，無疑是自創刊時起一直未變的。徐佳貴指出維新運動時期部分辦報人士「將辦報視為成書的過渡」。<sup>100</sup>且即使未等辦報一方重編重印，但線裝出報的物質條件，仍可以使讀者按自己的需要將報重訂為書。<sup>101</sup>蒙學公會自印的單行書籍只有葉氏兄弟之著

<sup>96</sup> 汪大鈞，〈會友博議·汪君頌虞論改報例〉，《蒙學報》，2（上海，1897.12），頁37。引文中的〈啟蒙字書〉，是葉瀚自第1期起連載的篇目。

<sup>97</sup> 蒙學公會，〈來書總覆〉，《蒙學報》，6（上海，1897.12），頁40。

<sup>98</sup> 比如，浙江瑞安的廬生林駿（1862-1909），在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1898.7.11）的日記中記錄替學生孫詒斌「彙訂《湘學新報》」事。參見清·林駿著，溫州市圖書館編，沈洪保整理，《林駿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上冊，頁109。晚清時期的報刊因其物質條件，在可讀性上未免存在問題，但其舊式的裝訂方式，卻為讀者自行重訂等靈活使用創造較大空間。相關討論參見八百谷晁義，〈《湘學報》重編與重印研究〉，《漢語言文學研究》，2021：4（開封，2021.12），頁86-87。

<sup>99</sup> 《蒙學報》館，〈本館告白〉，《蒙學報》，40（上海，1899.3），頁1。

<sup>100</sup> 徐佳貴，〈維新、經世與士人辦報——以杭州《經世報》（1897-1898）為個案再論維新報刊史〉，頁119-120。

<sup>101</sup> 後來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蒙學報》出滿100期之際，將過去刊載的內容重訂成《蒙學叢書》販售。參見《蒙學報》館，〈《蒙學報》一百冊訂成叢書全目〉，

作等少數例子，因此可以說蒙學公會出書的事業，實則與辦報一體。

關於創辦學堂，蒙學公會在其〈公啟〉上業已說明「本會初始，先辦書報，後立學堂」，以學堂為未來的目標，但也提出具體計畫：「將來立學，擬分二館：一曰童蒙師範學，一曰幼童養育學，再加擴充，擬設中等專門之學，庶成才日多，上之可備國用，下之不失本業，心期之副，力薄為難，裘腋之功，當資眾舉。」<sup>102</sup>嗣後於光緒二十三年底，有讀者「辦報宜兼設學堂」的建議，蒙學公會也回應說：「本會初意，極願立塾，祇因力薄為難，且塾中苦無讀本。是以先辦書報，庶幾流布四方，或可風氣稍開，將來立塾較易見效。固不徒慮限於一隅，成才未廣也。」<sup>103</sup>蒙學公會後在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1898.6.29）發行的《蒙學報》第 26 冊登出告白說，擬於七月初一日（1898.8.17）開辦速成教習學堂，於七月十六日（1898.9.1）開辦蒙學堂。<sup>104</sup>關於學堂招收何等學生和教授何種內容，蒙學公會在《新聞報》上刊登的廣告載有更詳細的信息。速成教習學堂謂「特仿日本教術善法，……招取十七歲以上，三十歲以下已通華文者，教以東西文字、史志、地理、格致、化學、天文、算學，以年一（一年？）為期，即能盡得各學要領，而為人師矣」。<sup>105</sup>蒙學堂則在廣告中說「已聘定中文教習二人、西文教習二人，專教七歲以上學徒」。<sup>106</sup>

---

《蒙學報》，癸卯年（1903）改章第1冊（上海，1903.4），頁7-8；汪鍾霖，〈廣告〉，《蒙學報》，癸卯年改章第1冊，頁103。此時為了方便讀者自行重訂，《蒙學報》館在《新聞報》上登廣告說「凡曾購本報未滿百冊，以及或有遺缺者，速來補齊，方可彙訂成書」。參見《蒙學報》館，〈《蒙學報》改叢書預告〉，《新聞報》（上海），1903年4月5日，頁4。

<sup>102</sup> 蒙學公會，〈蒙學公會公啟〉，《時務報》，42（上海，1897.10），收入《中國近代期刊彙刊 強學報·時務報》，第4冊，頁2903-2904。

<sup>103</sup> 蒙學公會，〈來書總覆〉，《蒙學報》，6，頁39。

<sup>104</sup> 蒙學公會，〈蒙學公會告白〉，《蒙學報》，26，頁4。

<sup>105</sup> 蒙學公會，〈蒙學公會速成教習學堂招生徒啟〉，《新聞報》（上海），1898年7月26日，頁4。

<sup>106</sup> 蒙學公會，〈蒙學公會新立蒙學堂告白〉，《新聞報》（上海），1898年7月29

兩間學堂的實際運作狀況無法得知。但在《新聞報》上常見速成教習學堂因報名學生遲遲未到齊而催學生報到的廣告。<sup>107</sup>由此推測，學堂似乎辦得沒有那麼成功。<sup>108</sup>

#### 四、蒙學公會與康有為集團

過去的研究提到蒙學公會時，很少注意其與維新運動時期政治紛爭的關係，但其實蒙學公會與此時的《時務報》館之爭有一定的關係。

《時務報》館之爭的起因是康有為集團要將《時務報》成為宣傳康有為學說的報刊，逼汪康年讓出《時務報》。<sup>109</sup>康有為最後透過御史宋伯魯（1854-1932）代奏，竟試圖使用皇權爭奪《時務報》。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7.17），宋伯魯奏請將《時務報》改為官報，<sup>110</sup>嗣後六月初八日（1898.7.26），清廷下諭決定將《時務報》改為官辦，派康有為督辦其事。<sup>111</sup>

---

日，頁4。蒙學堂學生的年齡上限是20歲。參見蒙學公會，〈蒙學會蒙學堂告白〉，《新聞報》（上海），1898年8月25日，頁4。

<sup>107</sup> 比如：蒙學公會，〈蒙學公會速成教習學堂催生報名啟〉，《新聞報》（上海），1898年8月10日，頁4；蒙學公會，〈蒙學公會速成教習學堂告白〉，《新聞報》（上海），1898年8月18日，頁4。

<sup>108</sup> 經營學堂的事業，在下文所述蒙學公會與《蒙學報》館分開後，仍歸蒙學公會辦理。光緒二十四年七月間，王國維向汪詒年詢問說，「刻有友人欲學速成教習科，未識額已滿否？抑或尚可入學？茲將名條二紙，請條詢浩吾（葉瀚）先生處，請其示復為荷」，由此可知，學堂之事仍歸已退出報館的葉瀚辦理。參見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一）》，〈王國維·四〉，頁89。

<sup>109</sup> 關於《時務報》館之爭，參見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頁180-206；賈小葉，《戊戌時期學術政治紛爭研究——以「康黨」為視角》，頁114-127。

<sup>110</sup> 由宋伯魯代奏的康有為奏摺，參見孔祥吉編著，《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頁297-300。

<sup>111</sup> 世續等編，《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卷421，頁3840，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庚寅條。中央政府令康有為赴上海督辦官報的決定，也與在北京的政治紛爭有關。此時，康有為集團與工部尚書兼官學大臣孫家鼐等，正爭奪京師大學堂教學的主導權，孫家鼐藉康有為集團提出將《時務報》改官報的要求，順勢提議令康有為督辦此事，將其趕出北京。參見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567-570。

清廷將《時務報》改官報、派康有為督辦的決定，大大衝擊了武昌張之洞幕府和以汪康年為中心的《時務報》館周邊人士。張之洞幕府的陳慶年（1862-1929）於六月十三日（1898.7.31）閱《申報》得知將《時務報》改為官報的決定，謂：「今年康黨欲逐汪穰卿（康年），以奪報利，為梁節庵（鼎芬）所阻。故此嗾宋（伯魯）為此奏，挾朝以行其私謀，攘大利以行其邪說。此等心術，安能任變法之事乎？」<sup>112</sup>葉瀚於六月十一日（1898.7.29）給汪康年寫信說，得知「《時務報》歸官督辦，同氣之殘，令人髮指」。葉瀚在此信上說道，他與姚文倬（?-1911）、吳仕鑑與陳漢第（1874-1949）等討論過應對辦法，都認為康有為之妄舉人所共憤，而且朝廷派人督辦《時務報》，可視取法，對汪康年來說也是一種榮譽，所以「爭非上策，退有可圖」。那麼退讓《時務報》後，應如何與康有為對抗？葉瀚認為，應聯合農學會、蒙學公會等浙籍人士在上海擁有的群體力量，成立浙學會。關於浙學會的組織結構，葉瀚說道：

浙學會自弟回後，已為調停主持，以浙學會為總目，而以時（務）、格（致）、農（學）、蒙（學）四會為體。且南海（康有為）偽學，其勢雖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將來，必一敗塗地。但目今其聲氣可席捲天下，被累不少，故弟與同志約，不容彼黨侵入浙界，務須仿日本進步黨所為，留以有待。眾僉謂然。故浙學速成，則彼黨來，公逐之可矣。<sup>113</sup>

由於康有為集團的影響力逐漸擴大，葉瀚等人試圖團結浙江人士，來與康有為集團對抗，這正是浙學會的構想。在此構想中，「聲勢亦已不小」的農學會與蒙學公會，直接歸併為浙學會的分會，承擔重要任務。如上所述，《時務報》、《農學報》與

<sup>112</sup> 陳慶年，〈戊戌己亥見聞錄〉，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8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116。

<sup>113</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五十四〉，頁2599-2600。

《蒙學報》，均為以江浙人士為核心力量並在上海發行的報刊，三報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關係。以此為背景，浙江人士在既有的合作基礎下，試圖「與浙中同志創一學會，合農（學）、蒙（學）、格（致）、時（務）為一，專講實學，以杜康教之侵吾浙士」，<sup>114</sup>可謂順理成章。

值得注意的是，葉瀚等人創立浙學會的計畫，與地方官吏有一定的關係。上引葉瀚書信，明確提到他們為了此計畫聯繫浙江巡撫廖壽豐（1836-1901）、杭州知府林啟（1839-1900），獲得同意的事實。<sup>115</sup>還有，為了應對康有為集團而聯合上海浙江人士創設的報館和學會的想法，或部分出自張之洞。至少可以說，上海浙江人士應對康有為集團的辦法與張之洞的想法有一致之處。<sup>116</sup>此時身處武昌的葉瀚在於六月二十二日（1898.8.9）寫給汪康年的信函中，詳細說明張之洞為了維持大局，願意支持汪康年的立場以及張之洞的應對方案。張之洞命汪康年改《時務報》為《昌言報》，意圖只將「時務」之名目讓給康有為，報刊則以「昌言」為名，繼續在民間發行。葉瀚說「帥（張之洞）所言《農（學）報》宜歸並一處者，誠恐《農報》館稍有田地產業，康（有為）或有覬覦，故不如與《昌言報》歸並一處，而兩館之經費用款，仍可各自清理也，並無他意在內」。由此可知張之洞也有合併報刊的想法。此時張之洞想派梁鼎芬為《昌言報》總理，這引起汪康年的不滿。汪康年知道張之洞想合併兩報，或許擔心張之洞要透過梁鼎芬控制滬上浙人報刊，因此葉瀚說服汪康年，張之洞讓汪康年將《昌言報》與《農學報》合併，是為了保護《農學報》館的田地產業起見，並無他意。<sup>117</sup>筆者認為，滬上浙籍人士與武昌張之洞幕府都在此時考慮合併滬上浙人報刊，是以此三家報刊成立以來良好的合作與分工關係為前提，而面對康有為集團影響

<sup>114</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二）》，〈陳漢第·六〉，頁2045。

<sup>115</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五十四〉，頁2600。

<sup>116</sup> 張之洞對《時務報》改官報的應對方案，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263-272。

<sup>117</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十〉，頁2611-2612。

力逐漸擴大，為了與其對抗，不管是汪康年、葉瀚等滬上浙籍人士，還是武昌張之洞幕府以及廖壽豐、林啟等浙江地方官，均試圖動員一切可用的資源。<sup>118</sup>

正好在蒙學報館被捲入政治風波時，蒙學公會對其事業進行了大幅調整。最大的變化是，將《蒙學報》的發行工作獨立於蒙學公會之外。《蒙學報》在第 28 冊上告白說，「前因設立學堂事務殷繁，而印報機器適又修理，致未能按期寄報，歉仄萬狀。現已擬定新章，竭力整頓，從七月初一日（1898.8.17）起，凡係蒙學公會中事，概歸總董汪穰卿（康年）辦理，本館專辦報務」，<sup>119</sup>並在同一頁上，發表新的辦事人員名單。<sup>120</sup>比較新舊辦事人員名單，除總理汪鍾霖留任外，其他舊辦事人員全部退出辦報團體，且除了許克勤、茅謙、葉耀元和茅迺封之外，其他新辦事人員均非蒙學公會會員。另外，第 28 冊登載〈會友續題名〉後，《蒙學報》不再刊登蒙學公會會員名單。由此可見，從光緒二十四年七月起，蒙學公會與《蒙學報》館一分為二了。

關於公會與報館分開的原因，公會成員的公開說明是設立學堂事務很繁，學報未能按期出刊。<sup>121</sup>除此之外，似還有經費問題。《蒙學報》在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1898.6.3）發行的第 23 冊上，與《時務報》館、《農學報》館一起登出〈告白〉，謂「本館出報已久，欠欸甚多。照章，閱報先付報費，理應陸續收齊。……從端節起，凡承代派閱報之處，概照收數寄報，如全未

<sup>118</sup> 張之洞在爭奪《時務報》的糾紛中堅決站在汪康年一方，不僅為汪康年劃策，還與在中央對此問題較有發言權的孫家鼐聯絡，試圖保護汪康年的《昌言報》。參見清·張之洞著，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第 9 冊，〈致管理大學堂孫中堂〉，頁 339。

<sup>119</sup> 《蒙學報》館，〈本館告白〉，《蒙學報》，28（上海，1898.7），頁 56。

<sup>120</sup> 《蒙學報》館，〈本館辦事諸人姓氏〉，《蒙學報》，28，頁 56。新的辦事人員為：總理，汪鍾霖；撰述，許克勤、茅謙（1847-1917）；東文翻譯，松林孝純（1856-?）；總圖繪兼算學撰述，葉耀元；總校刪潤，茅迺封（1877-1961）；圖繪清稿，包敦善；校對清稿，郭曾壽；寫稿周濟川；總發報，胡守之；司帳袁司鶴。

<sup>121</sup> 汪鍾霖在《新聞報》上刊登的告白也說「因設立學堂事務紛繁」。參見汪鍾霖，〈《蒙學報》館告白〉，《新聞報》（上海），1898年9月6日，頁 4。

付欸，概行停寄，以節糜費。其全數付清者，仍按期寄報」。<sup>122</sup>由此可見，未能順利收取報費，是《蒙學報》館等報館共同面對的問題，這對報館的運作造成經濟壓力。《蒙學報》館與蒙學公會分開後，汪鍾霖於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1898.9.6）向汪康年寫信報告《蒙學報》館館中事，謂：

敝處報務，刻承同人公議，歸弟專辦，惟力棉才短，一切仍求公隨時救正為幸。報中繙譯各件，原擬仍求敬翁（曾廣銓）指教，無如獨立肩承，經費甚形支絀。現擬將西文停譯，專請東人暫譯東邦各種教科書，以支此殘局。專此，敬求公代致敬翁並道歉衷。<sup>123</sup>

此通信函說明，《蒙學報》之所以未能繼續請曾廣銓參與報務，並放棄登載西文翻譯，是因「經費甚形支絀」而無法為曾廣銓提供充分的報酬。直到光緒二十五年，還有人向汪康年投訴汪鍾霖管理《蒙學報》帳房之不善。<sup>124</sup>由此可見，《蒙學報》館一直頂著經費上的巨大壓力。光緒二十三年六、七月間，面對康有為集團施加的壓力，以汪康年為中心的江浙趨新人士對其在上海地區所擁有的報刊事業進行了相應的調整。汪康年將《時務報》改《昌言報》，《時務日報》改《中外日報》，均在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sup>125</sup>與《蒙學報》館從蒙學公會獨立的時間一致。就現有史料而言，無法確知何種原因最後讓蒙學公會與《蒙學報》館分開。筆者的看法是，《蒙學報》一直承受著經濟上的問題，

<sup>122</sup> 蒙學公會，〈本館告白〉，《蒙學報》，23，頁2。

<sup>123</sup>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一）》，〈汪鍾霖·一〉，頁1114。張之洞對曾廣銓的評價甚高，故透過葉瀚提醒汪康年不可將其放去。參見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葉瀚·二十二〉，頁2612。汪鍾霖特別交代未能請曾廣銓留任的理由，應與此有關。

<sup>124</sup> 汪康年的外甥樓思誥（1871-?）屢次向汪康年提出《蒙學報》報費方面的問題。參見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樓思誥·十七〉、〈樓思誥·十八〉、〈樓思誥·十九〉、〈樓思誥·二十二〉，頁3936-3938、頁3941。

<sup>125</sup> 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頁235-244。

汪康年等江浙趨新人士在遭受來自於康有為集團的壓力、試圖透過調整其報刊事業渡過難關時，汪康年、葉瀚、汪鍾霖等蒙學公會核心人士，綜合考量政治、經濟等因素，最終決定將學會與報館分開。

戊戌政變後，蒙學公會似隨之雲散。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清廷下令查禁各地報館，<sup>126</sup>但《蒙學報》仍能繼續發行。比如湖南是政變後的重點整治地區，因此湖南的《湘報》與《湘學報》在政變發生後均停止發行。<sup>127</sup>《蒙學報》仍能發行是因採取了名義上將報館讓給日本人的策略。《蒙學報》館在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1898.11.8）的《新聞報》上，以日本人香月梅外（1875-?）的名義刊登告白說，「本館總理汪君甘卿（鍾霖）因蒙學公會議設輯譯啟蒙書局，自九月初一日（1898.10.15）起，將報館盤與敝人（香月梅外）接辦，已奉有日本帝國總領事府准照。現仍請汪君總理庶務，照常出報」。<sup>128</sup>雖然名義上讓給了日本人，但在政變

<sup>126</sup> 清廷於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1898.10.9）下諭著各省督撫查禁報館，嚴拿主筆。該上諭參見世續等編，《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28，頁3910，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乙巳條。

<sup>127</sup> 清廷於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898.10.6），下諭將湖南巡撫陳寶箴（1831-1900）即行革職，永不敘用。同日又下令張之洞將南學會、保衛局等新政成果一律裁撤，銷毀會中相關檔案。參見世續等編，《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28，頁3907-3908，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壬寅條。《湘報》在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一日（1898.10.15）發行的第177號上，佈告說「頃聞電傳上諭，令各省督撫飭各報館一律停辦。本館遵奉，即於明日停報」。參見《湘報》館，〈本館告白〉，《湘報》（長沙），1898年10月15日，頁1。《湘學報》最後一期第45冊在封面上的發行日期為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898.8.8），但其實際發行日期一般晚於封面發行日期，有時會晚一個月以上，因此《湘學報》也很有可能到政變發生後才放棄發行。參見八百谷晃義，〈《湘學報》的經營、流通以及其在維新運動史上的位置〉，頁100。

<sup>128</sup> 香月梅外，〈《蒙學報》館告白〉，《新聞報》（上海），1898年11月8日，頁1。引文中「自九月初一日起」的「自」字，《新聞報》的告白中原係空白，現據《蒙學報》第34冊上內容幾乎一致的告白補上。參見《蒙學報》館，〈本館告白〉，《蒙學報》，34（上海，1898.10），頁4。另，《蒙學報》第34冊上的告白說，汪鍾霖將報館名義讓給香月梅外的日期為八月初一日，但《蒙學報》因為有組織上的調整（或許也有政變的影響），政變前後暫推遲出報，於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五日（1898.10.19）時，只印至第33冊，參見《蒙學報》館，〈《蒙學報》館告白〉，《新聞報》（上海），1898年10月19日，頁4。由此可以判斷，《蒙學報》第34冊上的日期為「九月初一日」之誤。

後《蒙學報》的發行並不順利，在九月出第33冊後，未能按旬刊的節奏出報，光緒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99.3.2），才出第40冊。《蒙學報》自光緒二十五年第1期的第40冊起，調整了報式與派報章程，並最晚在同年五月時，發行地址也移至汪鍾霖經營的報紙《字林滬報》館內。<sup>129</sup>如此，《蒙學報》在光緒二十五年後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發。

## 五、結語

如林盼所說，庚子前後葉瀚積極投身於政治運動中。葉瀚參與過的重大政治運動有正氣會、上海紳商聯名上書勸阻廢立與中國議會三項。<sup>130</sup>在此可以指出，蒙學公會會員也積極參與到了上海紳商聯名上書勸阻廢立與中國議會等活動中。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0.1.26），獲知「己亥建儲」信息的上海紳商，以電報局上海總辦經元善（1840-1903）為代表，聯名上書表明反對立場。據〈電稟〉稱，參與此舉的紳商士民共計1,231名，在〈電稟〉上公開姓名的有51名，其中9名是蒙學公會會員。<sup>131</sup>據桑兵統計，中國議會的成員最多時達100餘人，姓名可考者有37名（其中章炳麟〔1869-1936〕和畢永年〔1869-1902〕後來退出），另外還有8名可能入會。<sup>132</sup>在姓名可考的成員中，有6位是蒙學公會會員。<sup>133</sup>由此可知，蒙學公會中除了葉瀚以外，還

<sup>129</sup> 《蒙學報》調整報式與派報章程的說明，參見《蒙學報》館，〈本館告白〉，《蒙學報》，40，頁1。《蒙學報》的發行地址移至《字林滬報》館中，參見《蒙學報》館，〈《蒙學報》館告白〉，《字林滬報》（上海），1899年6月23日，頁6。汪鍾霖經營《字林滬報》，參見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支那名人鑑》（東京：外務省情報部，1924），頁499。

<sup>130</sup> 葉瀚參與庚子前後政治運動的狀況，參見林盼，〈失蹤的「塊餘生」——辛亥之前葉瀚史實補述與考訂〉，頁114-116。

<sup>131</sup> 經元善等所上〈電稟〉，參見清·經元善著，虞和平編，《經元善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頁309。在〈電稟〉上署名的蒙學公會會員有黃受謙、經元善、邱震、汪詒年、王季烈、葉瀚、袁純熙、章炳麟、祝秉綱（1868-?）。

<sup>132</sup> 中國議會的組織和人員，參見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頁107-110。

<sup>133</sup> 此6名會員為胡惟志、邱震、汪康年、文廷式（1856-1904）、葉瀚、鄭觀應（1842-1921）。

有不少會員參加了當時的政治活動。進而可以指出，以蒙學公會為代表的維新運動時期學會運動與庚子前後在上海地區的政治運動，在人脈上有一定的連續性。

本文透過考察葉瀚自維新運動時期前後的言論與行動，分析蒙學公會與《蒙學報》的特徵及其與前後史事之間的關聯。過去學術界在討論維新運動時期的學會與報刊時，大多只注意康有為集團積極參與的學會、報刊，很少注意每一個學會、報刊的獨特性格以及與康有為集團的關係。葉瀚等人在籌辦蒙學公會與《蒙學報》時，大大受到梁啟超〈變法通議〉，尤其是其中關於「幼學」討論的影響，但同時我們不能忽視葉瀚等人在辦學會、出報刊的潮流中，曾試圖突出自己的獨特性。葉瀚等人最後選擇「蒙學」這一主題，當然與其興趣有關，同時也是為了避免與其他既有報刊陷入惡性競爭，而進行合理分工的結果。葉瀚等人在《蒙學報》上的具體實踐，結合外國經驗和國內資源，逐漸讓其刊載的蒙學內容發展成熟，其實踐意義不可小覷。茅海建認為，在維新運動時期由康梁提出的改革構想多有「粗略的、不完備的」內容，「戊戌變法若能繼續走下去，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很可能只是過場性人物，很可能會出現新的領袖和主導人，歷經磨難，找到能夠達到目標的通途」。<sup>134</sup>那麼，蒙學公會可視作實踐層面主導蒙學這一領域的團體。戊戌政變的發生中斷了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改革政策，中央的肅清措施，也影響到地方的風氣。但以上海為中心的江南地區，仍有部分趨新人士繼續其現代化事業。獨立於蒙學公會的《蒙學報》在汪鍾霖帶領下調整組織結構並繼續發行，也是在政變前後未曾中斷的現代化事業之實例。可以說，戊戌變法在政變後仍得以部分延續。

蒙學公會的運作方式，諸如其公開組織成員、使用新媒介進行推廣和公開籌款等特點，使得聚集於蒙學公會的官紳群體，擁有了未依賴於官方統治機構的運動方式，可謂是趨新官紳作為群

---

<sup>134</sup> 茅海建，《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頁204。

體的成長。蒙學公會並非純粹的政治組織，《蒙學報》也不同于《時務報》等政論性報刊，是專注於實學的報刊。儘管如此，已擁有嶄新運動方式的聚集於學會的官紳群體，若面臨政治危機，也容易政治化，將學會的群體力量轉變為政治力量。進入光緒二十四年後，康有為集團的影響力逐漸擴大，維新派人士內部也出現了矛盾。面對此類新趨勢，葉瀚等浙江人士為了遏制康有為集團的勢力，試圖聯合上海地區的浙江力量設立浙學會。在此構想中，蒙學公會作為浙人在滬已有聲勢的學會，要承擔起重要任務。透過蒙學會等活動凝聚起來的人才力量，後來又為庚子前後的官紳政治運動做出了貢獻。

戴海斌認為，「晚清時代有一些身份不大不小、地位不高不低，而對於歷史實際進程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中等人物』」。<sup>135</sup>戴海斌重點分析了此等「中等人物」關於庚子事變，尤其是圍繞著「東南互保」的言論和行動。<sup>136</sup>桑兵討論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成立的中國教育會時，認為江浙地區的新型知識分子構成中國教育會的主體，指出「溫和派領袖葉瀚的經歷則反映出這一類人政治態度的變化發展」，「（中國）教育會中溫和派的思想與政治動向，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該會成員主要是戊戌以後一直活躍於江南政壇的開明士紳，他們大都從事文教新聞活動，與從官場到民間秘密會社的各種政治勢力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sup>137</sup>戴海斌與桑兵的研究均表明，庚子前後的局勢對中國知識群體的轉型帶來了巨大影響。筆者認為此等轉型懷胎更早，至少可以追溯到自甲午到戊戌的改革潮流中。

蒙學公會尚未成立時，葉瀚等人意欲實現的現代化事業有好幾項，有的一直無法實現，有的在維新運動時期付諸實踐，如葉瀚等人辦成的蒙學公會與《蒙學報》。他們當初設立諸多構想，

<sup>135</sup> 戴海斌，《晚清人物叢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2編，頁566。戴海斌關於「中等人物」概念較詳細的說明，參見同頁註81。

<sup>136</sup> 戴海斌，《晚清人物叢考》，2編，頁691-748。

<sup>137</sup> 桑兵，《清末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頁202-204。

在現實中有的被淘汰、有的被不斷調整，最後結出蒙學公會與《蒙學報》這樣的成果也不完全是必然的。從構想到成果，過程中夾雜著很多偶然性因素。當時的中國存在一群像葉瀚那樣的人物，胸中有很多現代化方案，也願意付諸實際。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們的應試成績不一定很好，大部分沒有考取進士功名，往往只是個舉人、生員。但他們大多感到國事日非，有向西方尋找救國方案的趨向。徐佳貴認為，甲午戰爭之前中國人接受西學知識，在地理位置上大概只限於京、滬以及為數不多的行政中心及通商大埠，但維新運動前後，此種西學知識逐漸開始地方化。<sup>138</sup>當然，此種趨勢不可能在中國所有地方都同時出現，但維新運動前後在江蘇、浙江等條件較好的地區，可以明顯看出西學知識地方化的趨勢。這意味著，雖然能接收到的知識質量參差不齊，但十九世紀末中國的社會變化為地方士人提供了越來越多新知識。這種知識可以激發他們的行動，讓他們響應行政中心及通商大埠先進人士的言行。維新運動的影響不局限於京滬等政治與商業中心，亦波及到其他地區，這不僅是由於京滬維新派人士的積極宣傳，被動員的一方也具備了條件。

林盼指出葉瀚在晚清時期的經歷與浙江的同鄉網絡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sup>139</sup>本文的分析也可以證實這一點。除此之外，我們還需注意葉瀚等中下層士紳與地方官府、封疆大吏的關係。汪康年、葉瀚等人將自己的構想付諸實踐，均離不開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支持，但前者的構想與後者所能允許的事業內容，也不可能永遠一致。筆者目前尚未看到張之洞直接談到葉瀚等人的蒙學實踐之史料，不過張之洞對其幕僚的蒙學事業，似未給予積極的支持。

光緒二十四年春，張之洞為了遏止康有為邪說，也為了糾正保守人士的迂說，動員以梁鼎芬為代表的心腹幕僚，撰寫了《勸

---

<sup>138</sup> 徐佳貴，《鄉國之際：晚清溫州府士人與地方知識轉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頁153-155。

<sup>139</sup> 林盼，〈失蹤的「塊餘生」——辛亥之前葉瀚史實補述與考訂〉，頁122。

學篇》。<sup>140</sup>張之洞在此書外篇卷一〈益智〉中強調學習西方的必要，說「此教養富強之實政也，非所謂奇技淫巧也」。不過，張之洞將中國人才愈陋的責任歸咎於士大夫的「固陋虛驕」和「僥倖怠惰」，未對中國的教育方法提出疑問。在附篇〈愚民辨〉中亦謂，最近逐漸有人發現中國人之智力不如西人，「則歸咎於中國歷代帝王之愚其民，此大謬矣」。張之洞歷數中國歷代教育之良法，並強調同治以來清朝引進西學的努力。對於中國為何不出人才的疑問，張之洞說「是不學者負朝廷耳」。<sup>141</sup>雖然此論直接針對的是梁啟超的〈變法通義〉，<sup>142</sup>但葉瀚等人受梁啟超的影響，試圖按照西方的教育方式來重新設計童蒙教育。筆者認為張之洞不太可能積極支持葉瀚等人的嘗試。

張之洞等京外大官對農學會和《農學報》的態度，亦為筆者做上述判斷之旁證。如上所述，蒙學會基本上沒有品級較高的官員加入。與之相反，張之洞等大官對農學會的態度很積極。張之洞於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1897.8.17）寫信給《時務報》館的汪康年、梁啟超，說「農學會請附賤名，謹捐助銀元五百元」，<sup>143</sup>隨後在《農學報》的會員和助款者名單中出現了張之洞的名字。<sup>144</sup>除了張之洞以外，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1823-1901）也加入農學會。<sup>145</sup>政變後的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1898.11.16），兩江總督劉坤一（1830-1902）上奏說朝廷禁止創立學會、發行報刊，是為了防止士大夫「逞臆說而植黨援」，所以「至於農學

<sup>140</sup> 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頁37-41。

<sup>141</sup> 清·張之洞，《勸學篇》（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外篇卷1，頁81-88。

<sup>142</sup> 梁啟超認為，中國在古時人口少但才智之士多，但現在人口多而才智之士卻少，其原因是「先王欲其民智，後世欲其民愚」。參見梁啟超，〈變法通義·論學校一·總論〉，《時務報》，5（上海，1896.9），收入《中國近代期刊彙刊 強學報·時務報》，第1冊，頁272。

<sup>143</sup> 清·張之洞著，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致汪穉卿、梁啟卓如〉，頁120。

<sup>144</sup> 農學會，〈農學會續題名〉、〈捐款姓氏續登〉，《農學報》，7（上海，1897.8），頁61。

<sup>145</sup> 農學會，〈農會續題名〉，《農學報》，5（上海，1897.7），頁67。

會、《農學報》、商學會、《商學報》，實所以聯絡群情，考求物產，於農務、商務無不裨益，似不在禁止之列。可否仰懇特旨，准其設報、設會，或即由臣出示曉諭，以免農商有所疑畏？仍不准其妄議時政，以杜流弊」，<sup>146</sup>旋後於同月二十五日被清廷採納。<sup>147</sup>中國原是以農立國，改良農務的重要性不可質疑，而甲午戰敗後興起的改革潮流使得在鐵路、農務等未直接觸碰政治制度的領域中引進西方技術，獲得了正當性。因此，張之洞等大官列名農學會，用不著太大忌諱。相比之下，蒙學公會試圖依照西方的理念重構中國的教育模式，其敏感度似比農學要高。而且科舉制度尚未改革，透過新教育模式培育出來的人才，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中尚無適當的安置之處。此種原因使得張之洞等大官未積極支持蒙學公會，在政變後十分蕭條的政治環境中，農學會還能請劉坤一出面保護，但《蒙學報》館只能用掛日本牌子的方式渡過難關，也多少反映著政府大官對兩報態度之不同。

葉瀚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1897.11.24）與日本人山本憲（1852-1928）說道，「上下人之中，尚多同志，當塗袞袞，鮮遇知音，不得已返而設立蒙學公會」。<sup>148</sup>若將此發言放在維新運動時期前後葉瀚的政治生涯軌道中玩味，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武昌與上海，士人的活動環境有所不同。即使在上海，汪康年、葉瀚等人也時時被張之洞干涉，但由於人不在武昌，張之洞也無法完全控制他們。<sup>149</sup>對很多趨新人士來說，需要督撫階層在政治上提供

<sup>146</sup> 清·劉坤一著，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書組點校，《劉坤一遺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3冊，〈農商報館會名不在禁例片〉，頁1067-1068。引文中的「商學會、《商學報》」，是汪大鈞於光緒二十四年七月設立的工商學會和《工商學報》，參見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頁425-436。

<sup>147</sup> 世續等編，《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32，頁3950，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乙巳條。

<sup>148</sup> 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山本氏明治三十一〔1898〕年排印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頁38b-39a。引文中的「當塗」，固然可以視為泛稱，但其具體所指應為張之洞。

<sup>149</sup> 張之洞時常干涉《時務報》的內容，但無法完全控制汪康年等人文章的內容。參見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頁121-136。另，張之洞不能完

庇護，以及在經濟上提供支持。但維新運動前後，組織學會與經營報館的經驗，使得趨新人士擁有了凝聚團體力量與發表政見、組織輿論的新方式，同時提升了自信心。只是到戊戌政變前後，如張之洞那樣較開明的督撫與趨新人士之間的隙縫尚未明顯，只要未有極端言行，張之洞尚可默認他們的行動，也將其看作扶助的對象，還會替他們尋找生存之路。<sup>150</sup>後來葉瀚等趨新人士在庚子前後參與過的政治運動中，顯示出更大的能動性。像參加中國國會那樣的「少年文士」，雖是「未嘗無講求時務、才藝可造之材」，但居然「附和同聲」康梁、自立會等「逆黨」，這讓張之洞覺得「誠不解其倒行逆施，干名犯義，迷惑一至於此」。張之洞雖然還想用〈勸戒上海國會文〉讓他們「改悔」，<sup>151</sup>但到此時，葉瀚等人與張之洞的分歧已經很大，竟然不顧張之洞等大官的意見自行組織政治運動，也是維新運動時期趨新人士群體成長的結果。

---

全控制楊銳、黃紹箕等人在北京的政治行動。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頁160-161。

<sup>150</sup> 比如，政變發作後清廷尚未明確禁止辦報之前，張之洞與孫家鼐發電，提議《時務報》不必改官報，仍以民間報刊的形式，繼續讓汪康年辦理。參見清·張之洞著，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9冊，〈致孫中堂〉，頁345。

<sup>151</sup> 清·張之洞著，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與余晉珊〉，頁77。此信寫於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1900.11.12）。余晉珊，即余聯沅（1844-1901），此時任上海道。

附表 蒙學公會會員名錄

姓名拼音 首字母	編號	姓名	字號	籍貫	身分	名單刊期	是否為農 學會會員
C	1	蔡映辰	少嵐	江蘇東臺	候選訓導	28	否
	2	蔡震	疆志	浙江德清	增生	7	否
	3	陳步鑾	恆甫	廣東海陽	戶部主事	1	否
	4	陳昌紳	杏生	浙江錢塘	丙戌翰林	1	否
	5	陳承甲	雨亭	廣東海陽	候補同知	1	否
	6	陳桂元	逸樵	福建廈門		10	否
	7	陳慶林	伯儒	江蘇吳江	附生	10	是
	8	陳榮袞	子袞	廣東新會		26	否
	9	程猷	雲生	江蘇奉賢	乙未進士	7	否
	10	程增瑞	觀岳	江蘇吳縣	分部郎中	26	否
D	11	狄葆賢	楚卿	江蘇溧陽	候選知縣	1	是
	12	丁秉彝	敬侯	江蘇揚州		3	否
F	13	范緯	子眉	江蘇元和	癸巳舉人	26	否
G	14	桂埴	東原	廣東南海	候選教諭	21	否
H	15	韓樹滋	穉夫	四川彰明	雲南候補知縣	1	是
	16	何彥昇	秋輦	江蘇江陰	使俄參贊	5	否
	17	何震彝	鬯威	江蘇江陰	丁酉舉人	5	否
	18	胡	郎仙	安徽		6	否
	19	胡燏棻	雲楣	浙江蕭山	順天府府尹	7	否
	20	胡惟志	仲遜	浙江歸安	附貢生	2	否
	21	胡祥鏞	劭介	江蘇元和	甲午舉人	1	否
	22	胡穎之	栗長	浙江山陰		8	是
	23	華蘅芳	若汀	江蘇金匱	候選知府	26	否
	24	黃春芳	延耀	廣東番禺		20	否
25	黃受謙	益齋	江西清江		26	是	
26	黃中慧	秀伯	江蘇鎮江	使西班牙參贊	20	否	
J	27	江標	建霞	江蘇元和	湖南學政	8	否
	28	蔣黼	伯斧	江蘇吳縣	附生	1	是
	29	經元善	蓮三	浙江上虞	候補道	3	是
K	30	康廣仁	幼博	廣東南海	候選通判	1	是
	L	31	李超瓊	紫翹	四川合江	知府用元和縣知縣	7
32		李松壽	健人	安徽合肥	丁酉舉人	28	否
33		李維格	一琴	江蘇吳縣	候選知縣	1	否
34		李筠壽	斐君	安徽合肥	優廩生	28	否

	35	梁啟超	任父	廣東新會	己丑舉人	1	是
	36	林選麟	樂中	福建永定	廩生	8	否
	37	劉家謔	少桷	江蘇上元	戶部主事	12	否
	38	劉石巖	梓嘉	湖南湘鄉	安徽候補知縣	24	否
	39	劉世璋	秉卿	安徽貴池	二品銜分省補用道	28	否
	40	劉世珩	聚卿	安徽貴池	二品銜湖北補用道	28	是
	41	劉燕翼	湘孫	浙江仁和	壬辰翰林	2	否
	42	劉怡慎	遜甫	安徽貴池	優廩生	28	否
	43	劉元楷	乙笙	浙江仁和	即補道	2	否
	44	陸懋勳	勉齋	浙江仁和	己丑舉人	1	否
	45	羅運陟	邠巖	江西武寧	候選郎中	6	否
	46	羅振玉	叔蘊	浙江上虞	附生	1	是
M	47	茅乃登	春臺	江蘇丹徒	附生	28	否
	48	茅迺封	漢臺	江蘇丹徒	附生	28	否
	49	茅謙	子貞	江蘇丹徒	甲午舉人	9	否
	50	宓清翰	蓮君	浙江慈溪	辛卯舉人	21	是
O	51	歐陽煊	雲衢	江西南城	湖北房縣知縣	4	否
P	52	潘力齋		廣東嘉應		15	否
	53	潘元善	性初	江蘇嘉定	附生	1	否
Q	54	邱憲	于蕃	江蘇山陽	候選訓導	1	是
	55	邱震	公恪	江蘇元和		26	是
	56	瞿昂來	鶴汀	江蘇寶山	候選通判	1	是
S	57	三多	六橋	滿洲	杭州駐防	23	否
	58	邵孝義	仲儀	浙江仁和	廩生	1	是
	59	邵章	崇伯	浙江仁和	廩生	7	是
	60	沈惟賢	師徐	江蘇華亭	辛卯舉人	19	否
	61	沈學	頤新	江蘇吳縣		4	是
	62	沈毓桂	贊翁	江蘇吳江	候選同知	2	否
	63	沈毓慶	肖韻	江蘇川沙廳	廩貢生	19	否
	64	沈祖憲	盤盒	浙江會稽	湖南知縣	12	是
	65	施世杰	鄭傳	浙江會稽	丁酉舉人	1	否
	66	孫淦	實甫	江蘇上海		1	是
T	67	譚嗣同	復生	湖南瀏陽	江蘇候補知府	1	是
	68	湯壽潛	蜚仙	浙江蕭山	安徽即用知縣	26	是
	69	唐繼盛	仲芳	江蘇吳縣	戊子舉人	4	否
	70	陶霖	恂存	浙江秀水		1	否
W	71	汪大鈞	頌虞	浙江仁和	使美參贊	2	是

	72	汪康年	毅伯	浙江錢塘	壬辰進士	1	是
	73	汪詒年	頌毅	浙江錢塘	廩貢生	1	是
	74	汪鍾霖	泰雲	江蘇吳縣	癸巳舉人	1	是
	75	王長麟	鳳儕	浙江秀水	附生	10	否
	76	王朝模	範卿	江蘇吳縣	附生	10	否
	77	王季烈	君九	江蘇長洲	附生	26	是
	78	王景沂	義門	江蘇江都	內閣中書	1	是
	79	王錫祺	壽護	江蘇清河	刑部郎中	2	是
	80	魏允恭	綱闇	湖南邵陽	內閣中書	2	否
	81	文廷楷	法和	江西萍鄉	內閣中書	2	是
	82	文廷式	道希	江西萍鄉	前翰林院侍讀學士	2	否
	83	吳德瀟	筱村	四川達縣	錢塘縣知縣	1	否
	84	伍湛忠	遂初	廣東	候補知縣	9	是
X	85	夏循坦	履平	浙江仁和	附生	1	否
	86	項藻馨	蘭生	浙江錢塘	附生	1	否
	87	徐乃昌	績餘	安徽南陵	補用道江蘇既補知府	28	否
	88	徐慶沅	芷孫	江蘇長洲		26	是
	89	徐元英	小農	浙江歸安	候選知縣	27	否
	90	許克勤	勉甫	浙江海寧	優廩生	1	否
Y	91	晏振祐	淡如	江蘇揚州	奉賢訓導	9	否
	92	楊德成	子美	江西德馨	前山東平原縣知縣	26	是
	93	楊文江		廣東海陽		1	否
	94	姚文倬	稷臣	浙江仁和	前雲南學政	26	否
	95	姚錫光	石荃	江蘇丹徒	補用府候補知縣	9	否
	96	葉澂	清如	浙江仁和	候選同知	28	否
	97	葉爾愷	伯臬	浙江仁和	陝西學政	27	否
	98	葉瀚	浩吾	浙江仁和	附生	1	是
	99	葉瀾	清漪	浙江仁和	附生	1	否
	100	葉文瀚	曉竺	江蘇東臺		28	否
	101	葉耀元	子成	江蘇吳縣	附生	1	否
	102	余銑	柳先	江蘇嘉定 原籍吳縣	江蘇候補同知	1	否
	103	袁純熙	粹初	江蘇元和	前浙江通判	26	否
Z	104	曾廣銓	敬詒	湖南湘鄉	兵部郎中	1	否
	105	查燮	新謀	浙江海寧		6	是
	106	張士瀛	子登	湖北江陵	蘄水教諭	8	是
	107	張祖廉	彥雲	浙江嘉善	優廩生	6	否

	108	章炳麟	枚叔	浙江餘杭		3	是
	109	章宗祥	仲和	浙江烏程		5	否
	110	章宗元	伯初	浙江烏程		5	否
	111	鄭官應	陶齋	廣東香山	候補道	23	否
	112	鍾天緯	鶴笙	江蘇華亭		26	是
	113	周長齡		江蘇儀徵		16	否
	114	周德馨	仲芬	江蘇吳縣	湖北候補知縣	4	否
	115	周學熙	緝之	安徽建德	癸巳舉人 工部郎中	2	是
	116	朱采	亮生	浙江嘉善	候補道	7	否
	117	朱家駒	昂若	江蘇奉賢	己卯舉人	4	否
	118	朱克柔	強甫	浙江嘉興	附生	1	是
	119	祝秉綱	心淵	江蘇元和	附生	1	否
	120	鄒振清	筱村	安徽霍邱	駐劄日本神戶兼大阪 府正領事	10	是

說明：會員名錄來源為《蒙學報》第 1-10、12、15、16、19-21、23、24、26-28 期，共 21 期上的會員名單。表中會員依漢語拼音之順序排列。

資料來源：《蒙學報》，上海，1897-1898。

（責任編輯：江昱緯 校對：黃品欣）

## 引用書目

### 一、文獻史料

《申報》，上海，1898。

《字林滬報》，上海，1899。

《時務報》，收入《中國近代期刊彙刊 強學報·時務報》，北京：中華書局，1991。

《神州日報》，上海，1909。

《湘報》，長沙，1898。

《湘學報》，長沙，1897。

《新聞報》，上海，1897-1898、1903。

《農學報》，上海，1897。

《蒙學報》，上海，1897-1899、1903。

清·皮錫瑞著，吳仰湘點校，《皮錫瑞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

清·江標著，黃政輯，《江標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

清·林駿著，溫州市圖書館編，沈洪保整理，《林駿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

清·張之洞，《勸學篇》，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清·張之洞著，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

清·經元善著，虞和平編，《經元善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

清·劉坤一著，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書組點校，《劉坤一遺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

孔祥吉編著，《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世續等編，《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

-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汪詒年編，《汪穰卿先生傳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 梁啟超著，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 陳慶年，〈戊戌己亥見聞錄〉，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8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101-138。
- 葉瀚，〈塊餘生自紀〉，收入丁守和、方行主編，《中國文化研究集刊》，5，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頁476-491。
- 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
- 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山本氏明治三十一年（1898）排印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 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支那名人鑑》，東京：外務省情報部，1924。

## 二、近人專著

-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鑿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 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茅海建，《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
- 徐佳貴，《鄉國之際：晚清溫州府士人與地方知識轉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 桑兵，《清末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 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 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 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 湯志鈞、湯仁澤，《維新·保皇·知新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 陽美燕，《日本在華首家政論報紙《漢報》（1896-1900）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 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 賈小葉，《戊戌時期學術政治紛爭研究——以「康黨」為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 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劉兆瑣，《清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9。
- 戴海斌，《晚清人物叢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
- 蘇雲峯，《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 中下正治，《新聞にみる日中關係史——中国の日本人經營紙》，東京：研文出版，1996。

### 三、近人論文

- 八百谷晃義，〈《湘學報》的經營、流通以及其在維新運動史上的位置〉，《新史學》，30：1，臺北，2019.3，頁55-116。
- 八百谷晃義，〈《湘學報》重編與重印研究〉，《漢語言文學研究》，2021：4，開封，2021.12，頁 82-93。
-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從中日兩國檔案看《國聞報》之內幕——兼論嚴復、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聞實踐〉，收入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從東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與人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頁107-195。
- 王汎森，〈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收入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增訂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8，頁 300-328。
- 王爾敏，〈南學會〉，收入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101-133。

- 李文海，〈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的學會組織〉，收入胡繩武主編，《戊戌維新運動史論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頁48-78。
- 李達嘉，〈江浙派維新人士與抗爭運動新模式的創立〉，《思與言》，58，臺北，2020.12，頁1-43。
- 汪叔子，〈京師強學書局考〉，收入方志欽、趙立人、林有能主編，《康有為與戊戌變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學術研究雜誌社，1999，頁189-204。
- 林盼，〈失蹤的「塊餘生」——辛亥之前葉瀚史實補述與考訂〉，《史林》，2016：6，上海，2016.10，頁112-122。
- 徐佳貴，〈維新、經世與士人辦報——以杭州《經世報》（1897-1898）為個案再論維新報刊史〉，《新史學》，27：2，臺北，2016.6，頁95-150。
- 馬忠文，〈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戊戌變法史研究述評〉，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編，《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檢討：問題與前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272-296。
- 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臺北，1978.6，頁475-484。
- 梅家玲，〈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傳譯、知識結構與表述方式——以《蒙學報》與《啟蒙畫報》為中心〉，收入徐蘭君、安德魯·瓊斯（Andrew F. Jones）主編，《兒童的發現——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史中的兒童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35-72。
- 陳旭，〈關於近代報刊中的漢譯伊索寓言研究——以《蒙學報》為中心〉，《或問》，36，吹田，2019.12，頁93-103。
- 陸胤，〈清末兩湖書院的改革風波與學統之爭〉，《史林》，2015：1，上海，2015.2，頁87-97。
- 陸胤，〈「普通國文」的發生——清末《蒙學報》的文體試驗〉，《文學評論》，2016：3，北京，2016.5，頁129-140。
- 傅寧，〈中國近代兒童報刊的歷史考察〉，《新聞與傳播研究》，2006：1，北京，2006.1，頁2-9。

閻小波，〈強學會與強學書局考辨〉，收入王曉秋主編，《戊戌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戊戌維新一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265-277。

八百谷晃義，〈清末変法運動期における学会の政治的活動〉，《歴史學研究》，901，東京，2013.1，頁35-55。

八百谷晃義，〈湖南不纏足会と変法運動〉，《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38，名古屋，2014.3，頁61-96。

八百谷晃義，〈十九世紀末における浙江士人の学会活動〉，《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41，名古屋，2017.3，頁61-94。

#### 四、電子資料庫

「全國報刊索引」電子資料庫，〈<https://www.cnbksy.com/home>〉  
(2021/1/21)。

## **Political Reform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On Ye Han, The Society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The Children's Educator***

Akiyoshi Yaotani\*

###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ders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s particular focus is on Ye Han,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Society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an organization guided by the belief that political reform should begin with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Ye Han was also instrumental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ldren's Educator*, a newspaper that advocated for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from the earliest ages upward. By examining Ye Han, The Society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The Children's Educator*, the paper helps us arrive a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In the aftermath of China's humiliating defeat i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Ye Han, who was then living in the interior city of Wuchang, attempted to found both a newspaper and a school. He failed in these attempts, however, due to fundraising difficulties and the stifling cultural atmosphere of Wuchang at the time. He then moved to Shanghai in the fall of 1897. There, together with Wang Kangnian, Wang Zhonglin, and others from the so-called Jiangsu-Zhejiang school, he established The Society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He also helped found *The Children's Educator*. The relatively liberal environment of Shanghai enabled Ye Han and other like-minded reformers to succeed, whereas the repressive and conservative environment of Wuchang had doomed them to failure. This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Tzu Chi University

paper also examines how Ye Han pitted himself and his allies against Kang Youwei and his followers during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Political activists such as Ye Han continu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Shanghai elite after 1900. By considering the activities of Ye Han and his allies, we can see how the elites grew in power as the Qing dynasty drew to a close.

**Keywords:** The Society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The Children's Educator*, Ye Han, Wang Kangnian, Reform Movement of 1898